

# 美国史研究通讯

The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3 年第 1 期

(总第 110 期)

主 编: 王 旭

副 主 编: 胡锦涛 韩 宇

编 辑: 韩 宇 高艳杰

责任编辑: 韩 宇

校 对: 李文硕 李 晶 王宇翔

出版者: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出版地: 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 25 日

本通讯的内容亦刊登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

[www.ahrac.com](http://www.ahrac.com)



# 目 录

## ◆沉痛悼念任东来教授（一）

- 痛悼任东来教授·····刘绪贻（1）
- 点点滴滴忆东来·····李世洞（4）
- 有厚度的人生——任东来教授的学术生涯·····李剑鸣（6）
- 吊东来·····李剑鸣（8）
- 难舍东来·····王旭（8）
- 永远的怀念——悼念东来·····王玮（11）
-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人生——追念好友任东来教授·····梁茂信（13）
- 天羨英才，东来西去·····王立新（15）
- 痛悼东来学长·····赵学功（16）
- 痛失东来学兄·····王晓德（18）
- 怀念东来·····赵梅（20）
- 东来同学留给我的印象·····石庆环（21）
- 沉痛哀悼任东来教授·····孙群郎（22）
- 任东来教授与美国史研究会·····韩宇（23）
- 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青年学者任东来教授访谈录·····胡晓进（26）
- 任东来教授著述目录·····（38）
- 唁函·····（53）

## ◆美国纪行

- 一个美国老妇人对中国的怀乡病·····王立新（82）

## ◆学术报道

- 美国学者介绍美国史研究的新进展·····王希（84）
- 黄安年教授积极推动北美铁路华工研究·····高艳杰（86）

## ◆学术动态

- 我会与 OAH 在东北师大成功举办“美国移民、种族与族裔”研讨班·····欧阳贞诚（87）
- 我会三位会员赴美参加 OAH 年会·····秘书处（87）
- 美国史领域多项课题获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秘书处（88）
- 东北师大举办“美国华裔：移民、美国化与认同”研讨会·····吕洪艳（88）
- 哈佛大学埃利泽·马尼拉教授访问北京大学·····史宏飞（89）

北卡罗来纳大学戴维·戈德菲尔德教授在北师大讲学·····	杨 亚 (90)
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特拉维斯·史密斯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	董 瑜 (91)
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简·亨特教授在暨南大学和华南师大讲学·····	吴金平 何 慧 (92)
华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	何 慧 (92)

**◆会员动态**

<b>任东来</b> 教授获“霍普金斯大学学人社”终身会员荣誉·····	秘书处 (93)
黄安年教授赴台北参加北美铁路华工圆桌论坛·····	高艳杰 (93)
王晓德教授做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名师讲坛”·····	鲁迪秋 (93)
陈海宏教授访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王综涛 (94)
付成双教授、张聚国和丁见民副教授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	(94)
李莉博士入围首届全国高校微课教学比赛全国决赛·····	秘书处 (95)

**◆重要通知**

关于举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的通知（第一号）·····	(96)
第五届万心蕙奖学金委员会公告·····	(97)

**◆讣告**

我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病逝·····	(99)
我会会员、大连大学张宏副教授病逝·····	(99)

<b>◆新书讯</b> ·····	(102)
-------------------	-------

<b>◆编后语</b> ·····	(104)
-------------------	-------

## 沉痛悼念任东来教授（一）

编者按：此专栏为纪念我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所设。纪念文章分期刊发，本期登出的是我会会员撰写的文章，其余的文章将在下期登载。专栏还刊发了秘书处收到的所有唁函，按照接收时间的前后顺序排列，特此说明。除了纪念文章和全部的唁函，专栏还刊发了任东来教授 2006 年的访谈录，还有任东来教授的著述目录。

# 痛悼任东来教授

刘绪贻

5 月 2 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任东来驾鹤西去，享年仅 52 岁。噩耗传来，沉痛难已。这不仅是中国美国史学术界、中美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建设团队、中国文化现代化促进派的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不可多得的忘年之交。伤感之余，尽管年老、体弱、事繁，还是禁不住提起笔来，回忆 30 余年来，我们交往中非常值得记忆的一些事迹。

根据任东来教授在《像刘绪贻先生那样生活》一文<sup>①</sup>中说，他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东北师范大学读本科时知道我的，当时他主要师从我的好友丁则民教授学习美国史。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攻读美国史专业硕士学位，后考入南开大学念美国史专业博士学位，导师都是我的好友杨生茂教授。1979 年末起，我和杨、丁两教授都被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我又兼秘书长。任东来只是我的两位好友的学生，和我非亲非故，也无特殊的渊源，但似乎很愿意和我认识交往。平时没有机会，到 1984 年 6 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他才第一次见到了我，如他所说，我是会议的组织者和学会的领导者，他还是茅庐未出的研究生，和我的接触很少。但他却和我带去的两个研究生何宏非和赵林成为了好友，一起游览成都的名胜。会后，他还顺江而下，来武汉大学逗留了几天，并到我家来拜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谈。从此以后，他不仅在有机会时，甚至创造机会和我接触。比如，1988 年 6 月，他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向他的导师杨生茂教授建议，邀请我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这种忘年之交，当然和后来我们两人都从事美国史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绩有关，但它的开始似乎只能说是有缘。

<sup>①</sup>《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85-87 页。

我和任东来认识以后，这位看似平常的青年的经历，可以说是天天向上，日益走向辉煌，令我刮目相看。1985年，他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学位，1988年，他获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1937-1946）》（1995年出版时题目改为《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综合运用了中国和美国档案材料，特别是别人不曾用过的、1980年代台湾陆续出版的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因此这篇博士论文具有特色，颇受好评，使他在美国美国史学术界渐露头角。1988年进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从事教研工作后，由于他阅读范围广泛，知识渊博，学术视野开阔，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宪政史等，而且在每一领域都取得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发给我的《任东来教授的学术简历》记载，他“先后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抗日战争研究》、《美国研究》、《欧洲》、《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香港《亚洲评论》和美国《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等学术刊物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还以‘东来’为笔名在《书林》、《读书》、《博览群书》、《学术界》、《中华读书报告》、《社会科学论坛》、《东方》、《世界知识》、《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和香港《明报月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学术评论与国际时评，并在《南方都市报》长期开设专栏。”

根据《任东来教授的学术简历》记载，任东来教授也是国际学术交流的积极参与者，自1992年以来，先后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1992）、挪威诺贝尔研究所（1993）、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4）、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1997）、洛克菲勒基金会（1999）、香港华英文教机构基金会（1999）和福特基金会（2002）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基金，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前往美国、挪威、意大利和香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研究。期间还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两度（1999-2000年、2005-2006年）赴美进行学术研究。鉴于任东来教授在美国研究与中美文化交流领域的杰出贡献，2013年4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他“霍普金斯大学学人社”（The Johns Hopkins Society of Scholars）终身会员荣誉，系“学人社”建立数十年来中国内地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

除作为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以外，任东来教授还根据美国史学界提出的公共历史学（public history）的概念，做了一些工作。所谓公共历史学，就是从事非学术性的历史教育和普及工作，是面向大众、服务社会的。比如，他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和评价数据规范》以及它的衍生物《高校文科学报编辑规范》中注释规定的批评；比如给通俗性报刊撰写的有关美国内政外交的时事评论；又比如，他在写作《美国宪政历程》时，也试图以公共历史学的方式，扩大读者对象，促进专业历史知识的传播。

任东来教授为什么能有如此丰富的优秀学术成果？当然原因是有很多的，但是，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他非常注重并善于查找档案材料。比如，在他为博士论文取得一些基本资料后，他又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材料，在查找1943年《中美新约》的谈判记录时，馆员给他拿来了一大摞1946年《中美商约》的档案，他惊喜不置。原来这是整个十几次谈判过程的全套记录，因为当时谈判工作语言是英文，所以记录也全是英文档案，有关人员因为英文水平有限，也就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让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而在档案收录和编辑相当完善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对于这个谈判也只有存目，没有内容。他根据这些档案写成的《试论1946年中美商约》一文，突破了原来学界对中美商约视为“卖国条约”的政治性论断，而用扎实的原始文献，揭示了美国以推行战后贸易自由主义为由，对中国战后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种种干预，以及中国谈判者为维护国家权益所做出的艰苦努力，最终用客观的结论代替政治化的定论，该文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一篇主要基于中国档案写成的中美关系史论文。

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当充分，较好的一本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但是，沙勒能够看到的英文文献，任东来也能看到，而任东来利用的中文文献，沙勒却根本不知道，所以，在文献的发掘上，任东来就胜过了沙勒。

又比如，对于中美白银外交史，中国学者汪熙和第二档案馆的馆员郑会欣都做过很好的研究，但是，任东来却发现了新的材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它收录、翻译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英文档案。其中有当时驻美公使施肇基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往电文。以前研究中美关系的外交史学者没有注意到这套书，而金融史学者则对这一时期美国的白银购买政策缺少了解。他将货币史和外交史这两方面的中英文资料结合起来，较好地恢复了历史的全貌。<sup>②</sup>

以上，我们谈了我和任东来教授相识的过程以及他做学问的方法和成果，下面我将谈谈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我们两人都是性情中人，很珍惜私交和友谊。比如，1991年，我到南京参加任东来同僚蔡佳禾的博士论文答辩，他亲自到码头来接我；1999年夏，我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参加中美关系史讨论会，会后他和妻子吴耘教授请我和陪同我的研究生林婕到他家便宴。除互相赠送我们所有的著作外，他还根据我的兴趣，赠送我一套描写南京重要景点的《雨花神韵丛书》。我们还互相通报各自高兴的事件。我这方面的材料没有存底，无从引证。他那方面，比如，1999年2月，他和吴耘在意大利科莫湖美丽的贝拉焦半岛上进行研究工作时，在阅览室里翻看历次会议的合影照片，看到了我1984年在那里参加学术会议的合影，很高兴地写信告诉我说，我可能是最早去那里参加学术活动的中国人，还告诉我他们感到那里

---

<sup>②</sup> 以上两例的内容均摘自胡晓进《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青年学者任东来教授访谈录》，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6年，第12期。

的环境与服务过于奢华了。2001年7月17日，他从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来信，说他和14位中国学者在那里参加暑期讲习班，一方面加强对美国的了解，一方面欣赏美景。还有一件事情特别应该提到，2000年10月11日，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来电话，要求我将《战后美国史》从1986年增补到2000年，所需的资料主要是由任东来提供的。根据他2000年10月19日的来信，他让学生替我复印了两本美国政治史的书，他自己为我复印了两本较流行的外交史中最新的部分，另外，他和几位同学编了一本《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原名《20世纪美国》）送了我一本。当时，这些新书只有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才容易找到，而没有这些新书，我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是无法写成的。

现在回忆我和任东来教授30余年的交往，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互相促进，大大裨益了彼此人格的升华，学问的长进。这是一朵美丽的友谊鲜花。可惜的是，正当它盛开之时，忽然萎谢，教我这个百岁老人如何不深深伤感和沉痛！我衷心祝愿东来的弟子们能使他后继有人，东来的朋友们能永远记住他。特别是吴耘教授，我希望她能节哀保健，加深和扩展东来的学术影响，继续我们之间的珍贵友谊。

2013年6月12日于珞珈山求索斋

## 点点滴滴忆东来

李世洞

今天（5月3日）上午看到学会秘书处来函，告知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不幸病逝的消息。其实，昨晚杨玉圣教授发来短信说：他和李剑鸣教授一同去看望任东来，现正在回山东的高铁上，“在我和剑鸣辞行后不到两个小时，5月2日18时10分，东来即不幸去世了。”由于我事前不知道东来患病的消息，感到突然而不可理解。在回复的短信中写道：“怎么会这样呢？太让人想不到了。我总不相信这是真的。望你和剑鸣都要注意身体，不要拼命。”的确，我总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是，这又是明明摆着的现实。我当即给刘先生发去了电子邮件告诉这一不幸消息。

我和东来首次结识于1990年10月开封年会上。当时他代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参加年会。首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睿智、斯文、年轻、潇洒、风度翩翩。由于我做会务工作，他问我是否能给他一个晚上的时间，让他介绍一下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情况。我当即答应并作了安排，动员大家参加这次活动。届时，在十分简

朴的会场上，他先简要介绍了中心的概况，接着放映了该中心的幻灯片，并向参加者赠送了该中心建筑设施的明信片集。

此后，我和东来的交往不是很多。关于他的点滴信息，多从友人偶尔交谈中或者是网上文章中得来，大略知道他的一些研究学术活动。2006年11月，我因事去刘先生处，与东来意外相逢。原来他公出武汉，专门探望刘老。他主动、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由于和开封相见已有十多年之久，和当时我脑子里的印象已无法吻合，我愣在那里极不自然地应和着。也许他看了出来便大声说道：“我是任东来啊！”，并立即从挎包里拿出他和朋友撰写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在扉页上写道：“李先生指正：学生东来。2006,11.武汉”送给了我，之后又和我、刘先生合照留念。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原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后来转到武大政治系的谭君久教授。其实，2006年3月初，我和东来都参加了“学术批评网”成立五周年纪念会议，但阴错阳差没有直接见面，才出现了上面那短暂的“相逢不相识”的尴尬局面。

我和他虽非至交，但由于杨玉圣的“中介”使我对他也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东来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面也很广泛。他的著作既有美国法律史、法制史，也有外交史、中美关系、国际关系等。他还积极参加时事评论和学术批评活动。在学术批评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参加2006年3月学术批评网成立五周年纪念会时写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注释规范》，对中国学术期刊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他敢于发表自己看法的态度（如他对当时不同观点的两位学者的争论说“他们的讨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锋”），也看到了他认真分析、细致论证的治学精神。本以为他会在学术园地里培育出更多的奇葩，谁料想竟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学术事业，也离开了他的家人、亲人、朋友，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惋惜和遗憾。想及此，唏嘘不已。

东来的去世，使久已存在我心中的想法更加强烈。这就是向目前活跃在学术第一线的年轻朋友发出呼吁：希望你们在学术创造活动中注意劳逸结合，张弛有序，关爱自己，正像我发给杨玉圣和李剑鸣教授的短信中所说的，“都要注意身体，不要拼命”。

2013年5月3日

# 有厚度的人生——任东来教授的学术生涯

李剑鸣

**题记：**师兄任东来教授谢世，我一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很想写一点追忆的文字。正好财新《新世纪》杂志的编辑约稿，我便赶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稿子。编辑接到稿件后，表示“文章没有问题”，会“尽快编发”。但我看到的正式发表的稿子，却不完全是我写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编辑和我的合写稿，而我对这种合作却完全不知情。特刊布我的原稿，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我个人对东来师兄的缅怀之情，也免却无意中掠人之美的嫌疑。

在送别任东来教授（生于1961年5月4日，卒于2013年5月2日）的仪式上，每个参加者手里都拿着一份介绍逝者生平和学术的小册子，标题是《生命的厚度》。这五个字很有分量，也十分切合任东来教授的一生。他在盛年谢世，生命没有足够的长度；但在有限的岁月里，他做了许多有意义、有成就的事，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享受了充沛的友情和关爱，生活平顺而丰富多彩。他用52年相对短暂的时间，展示了一种不同的人生境界：生命的意义主要不在长度，而在厚度。

美风仪，善谈吐，兼具才情和学识，这是任东来教授留给人最鲜明的印象。他17岁上大学，27岁获得博士学位，在学术界素有少年才俊的美誉。而且，他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美国史博士，因而在国内这个领域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他在东北师大读本科，在中国社科院念研究生，在南开大学拿到博士证书，又在南京大学执教二十余年。他把这四个学术机构的特点熔铸一炉，以此获得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他的学术训练跨越法学和历史学这两个门类，研究和写作的题材则涉及众多的学科。他早年研究中美关系史，以学问专深著称，不论是博士论文，还是散见于多家刊物的论文，无不脚注繁复，论旨精当。大致在2000年以后，他把研究兴趣转向美国宪政史，侧重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论述美国宪政的理念和历程，既推进了国内学界的研究，又能满足具有一般知识水准的读者的需求。他还写了不少评述当前美国政治和国际热点的文章，大多富于时效，眼光敏锐，新见迭出。他的学术训练扎实过硬，又具有广泛的知识兴趣，因而所写的史学论著通常蕴含相关学科的理论，所写的政治学和国际时评文章则往往具有史家的见识，其论著的影响自然能辐射到历史学、政治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

和那种枯坐书斋的学者不同，任东来教授治学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据他自己说，他从中美关系史转向美国宪政史，一方面受到了王希教授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的启发，另一方面是他觉得宪政对于国家治理、公民权利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曾谈到，中国人讲宪法已近百年，却不知晓宪法的本义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和保护公民。在

在他看来，历史上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有之，无宪法而有宪政的国家亦有之，而美国则是既有宪法也有宪政的国家；美国的经验表明，宪法的意义在于转化为宪政，施行宪政的关键则不在于宪法条文有多完美，而取决于制度、文化和人。因此，他在研究美国宪政史时，关注的重点不是纸上的宪法条文，而是宪法如何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被人诠释和运用。他从法官、案件和判例来考察美国宪政的确立和演变。这是一种历史的路径，也是一种真正有助于理解美国宪政的方式。

任东来教授的现实关怀，同样体现在他对美国和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以快速的反应、灵动的文笔和不俗的见解写作时评，发表在许多报纸和刊物上，让人领略了一个史家看待当前世界的方式。当美国加州宣布取消照顾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措施时，他迅即撰文评说，断言此举必引发激烈的社会政治争议。在他之后，国内陆续有人写文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证实了他当初的即时判断是完全准确的。当国内还很少有人留意“族裔特性”的政治意义时，他便在《读书》发表文章，评介“ethnicity”在美国国内政治和更大的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

此外，任东来教授还关注国际国内的学术动向，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讨论。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数篇文章，介绍欧美学术规范，批评国内学术现状，倡导规范、公正和严谨的学风。在国内学术的规范化进程中，这些文章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任东来教授才思敏捷，思想活跃，知见博洽。他的本行是史学，但对政治学、宪法学和社会学始终保持高度的兴趣，对学术界的前沿进展相当敏感。而且，他能说流利的英语，善于与人沟通，在国内外学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加以经常出国访问和研究，因而能接触多种多样的学术资源，掌握丰富的学术信息。他向来心灵开放，与人为善，愿同他人分享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乐于为别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建议。他处事随和，应对机敏。2003年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代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用英语致词，针对前面发言的美方官员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评论，以幽默调侃的语气做了巧妙而睿智的回应，令听众击节赞叹。在日常生活中，他开朗健谈，说话节奏分明，声调起伏，时常伴以爽朗的笑声，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他交谈的人都感到轻松和愉快，常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在任东来教授去世前两三个小时，有朋友专程从外地到南京看他。当时他极度虚弱，说话困难，喘息不止，但仍然心系学术，并且反复叮嘱朋友们注意休息和保重身体。他还说，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要走了。说出这句话时，他声音哽咽，眼眶发红。他确实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因为他钟情学术，热爱生活，倘若天假以年，一定能写出更多有价值的书和文章。但他这一生又是相当完满的，因为他的事业自有学生继承和发展，他的亲人和朋友将会永远记住他的音容笑貌，这个世界由于他存在过而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2013年5月6日

## 吊东来

李剑鸣

五月金陵春事尽，风摧宝树竟凋零。  
清音在耳成遗响，热泪盈颊吊故人。  
细审古今存大志，精研究政著雄文。  
天堂幸似图书馆，把卷忘忧得永宁。

2013.05.06

## 难舍东来

王旭

东来英年早逝，令人唏嘘。每每看到纪念他的文字，我都不免感伤。直到今天，心境略为平缓，方有勇气拿起笔来，诉说我的思念。

我和东来一样，家在长春，但他从小在江苏外婆家长大，性格里既有江南人的细腻，又有东北人的豪爽。我们本科都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我在77级，他在78级。当时这两个年级的学生仅差半年时间入学，经常有很多联系。我了解他，喜欢他，敬重他。东来性格开朗，像个阳光大男孩，直到成为声名赫赫的大牌教授，还不时显出质朴纯真的天性。但在学术道路上，却是早熟的。他上大学时刚刚17岁，全年级最小，但似乎见多识广，人气超高。教室里、走廊上，经常听到这个“小大人”的声音。后来听他讲，小的时候，他就愿意凑在大人堆里，谈天说地评论古今。走在路上，也是他把手攀在别人肩头，与高他一头的人称兄道弟。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建，出任副理事长的丁则民先生率先在东北师大创办美国史研究室，又在77、78级学生中组建美国史研究小组，东来和我都通过考试成为首批成员。东来很快便成为美国史小组的灵魂人物。他消息灵通，反应机敏，口齿伶俐，气场超强，丁先生毫不掩饰对他的爱意，有意招收他为硕士研究生。但我们临毕业时，报考丁先生的居然多达48人，过录取线的很多，丁先生破例扩招，录取4名。这样一来，名额占满，半年后78级毕业时丁先生就不能再招生了，东来只好转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在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的指导下读硕士。硕士毕业时，南开大学世界史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他自然报考到杨生茂先生门下继续读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次年得到博士学位授权）。

虽然他没有成为丁先生的入门弟子，但他却格外受丁先生器重，俨然为编外弟子。在北京和天津读书时，东来寒暑假里回长春，都少不了到丁先生家拜访，每当这时，丁先生格外兴奋。每次东来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例如深圳设特区的争议，第一个股票市场开盘，社科院的新动态等。丁先生多次请他吃饭，我们在丁先生身边的几位门生，也未得到如此厚待，心生妒忌的同时，也增添几分敬重。也正因如此，我虽虚长几岁，但更多地把他视为兄长。丁先生主编《美国通史》第三卷，先后开过几次审稿会，有两次东来回长，也来参与，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为其增色。我记得他曾对“city boss”如何翻译与我商量好长时间。

从东来的求学经历看，他早年在丁先生引导下开始学习美国史，后追随杨生茂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学习和工作中又与刘绪贻、资中筠等前辈学者结成忘年之交，深得各路名家真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去世后，刘绪贻、资中筠、华庆昭、李世洞、黄安年、黄柯可、余志森等都发来唁电或写纪念文章，其中还包括南开大学已故冯承柏教授的妻子。在我们美国史研究会，能够受到如此多前辈学者看重的，恐怕为数不多。如果再把 100 多篇纪念他的文章或唁电加进来，东来的人脉就更可观了。

1988 年，27 岁的东来博士毕业，到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中心任教。作为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他无愧于“第一”的称号。他虽是国内的“土”博士，但丝毫不逊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不久，他很快就在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美关系史方面崭露头角，发表的著作和论文都可视为精品力作。后转攻美国宪政史，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后来人铺平了道路。1990 年郑州-开封年会上被选为理事，时年不到 30 岁。2002 年西安年会，又被选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当时，我提名他时，还担心他缺席年会选票受影响，但他获得理事会的认可，高票当选）。自 1992 年以来，他也先后获得全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香港华英文教机构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研究基金，以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的身份进行访问或研究，其中包括两度获得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赴美进行学术研究。鉴于东来在美国研究与中美文化交流领域的杰出贡献，2013 年 4 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他 The Johns Hopkins Society of Scholars 终身会员荣誉。可以说，他为国内美国史博士研究生培养开了一个好头，作出了表率。

他在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也能独挡一面。他不仅英文娴熟，而且在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中，大方得体，机敏应对。记得在 2005 年广州的美国来华富氏学者研讨会上，他侃侃而谈，一度主导会议的议题，这个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东来的能言善辩，我当然早就领教了，但在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上，用英文熟练地表达意见，将会议讨论推向一个高潮，与会的美国学者为之倾倒，还是给我一个不小的震撼。我深为我们研究会有这样的会员感到骄傲，如果有更多的这样优秀的中国学者，那将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局面。东来在中美文

化中心的授课也是深受欢迎，很多美国学者和学生都在纪念文章里提到这一点，不乏溢美之词。

在我会的对外学术联系方面，他也发挥了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自 2011 年起，我会开始与美国历史家学会（OAH）探讨建立正式交流关系。就此事我多次与研究会的外事小组商量，东来给的建议最多。从一开始，他就提醒我，建立这种联系非常繁杂，要做的事情很多，还会有意料不到的麻烦，要有思想准备。但他并不是做壁上观，而是积极献计献策，为研究会分忧。2012 年 4 月，在考虑组团去参加 OAH 的密尔沃基年会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因为这是双方建立联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展示我们研究会实力与风采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派出最强阵容，开个好头。最后确定东来、茂信和我一起前往，还有研究会顾问王希助阵。这几个人，英文交流都没有问题，而且各有所长，都从不同角度对双方交流提出很多好的建议，会谈和交流进行得很顺利。OAH 方面也非常重视，除了专门用一个上午时间召开 business meeting 外，还专门安排我们与 OAH 理事会全体成员共进午餐，同国际事务处成员共进晚餐，Alice Kessler-Harris 主席还在总统套房请我们共进早餐。一个月后，OAH 的现任主席和两位前任主席又联袂莅临我会上海年会，并再一次召开交流工作会议，落实双方学术交流事宜。在这些场合，东来都显示了他的外交能力和学者的风度，给美国同行很好的印象。深谙美国文化习俗的东来点子很多。在上海大学校长宴请美方代表的时候，他提议，不要干巴巴地坐下喝酒，而是先在外间放些酒水饮料和西点，大家随便交谈，类似美国的招待会，之后再开始宴请，这样效果确实很好。另有一件事情更值得在此提及：联合主办美国史研究的研讨班是我们和 OAH 交流的重头戏，为此，我们用了很长时间讨论。Kessler-Harris 代表 OAH 方面提出了大致设想，在谈到来主持研讨班的美国学者时，Kessler-Harris 说到美国方面会选派 junior scholars 来华，东来立即打断她的话，说应该是 senior scholars。可能 Kessler-Harris 没有料到我方会突然提出不同意见，一时语塞，场面尴尬。在学界和 OAH，Kessler-Harris 都是个重量级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出过质疑。但 Kessler-Harris 毕竟阅历丰富，稍停顿后，她用和缓的语气与东来交换意见，最后同意了东来的提法。后来证明，这是办好研讨班的一个关键环节，确实有必要坚持。这件事无疑给美方学者很深印象。我注意到，后来 Kessler-Harris 在撰文纪念东来时，用了这样一段话：I remember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wonderful moment in the Milwaukee conference when I first met Ren Donglai. He was such a lively and spirited presence, filled with good ideas and not afraid to tell us when he disagreed. 后面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她对东来的钦佩溢于言表。在我们研究会，有如此才干和胆识的学者为数不多。东来的离世，实在是我们对外学术交流方面重大损失。

东来对研究会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在患病期间，也念念不忘。2012 年 4 月 OAH 的密尔沃基年会，我们从中国直接到那里，他是从衣阿华州的 Grinnell 过去，约好在某饭店汇合。

王希、茂信和我早到一个时辰，在饭店里边用餐边等他。不久，窗外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恍然之间，似乎看到了大学时期经历清贫生活的东来。我觉得有些诧异，他说可能是在美饮食不规律，我们也就没有多谈，只是心中隐隐地感到不安。5月里的上海年会再见到他时，仍是清瘦，我一再叮嘱他要去查一查。后来，8月里，他给我来电邮告诉了我极不愿听到的消息。不过，他非常豁达，说这不过是个慢性病，无大碍，只是研究会的工作在一年内可能无法分心了。这句话令我十分揪心。11月，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在南京大学开第二次年会。这类会议，场面虽大，但形式大于内容，本不想参加，不过主办地在南京，可以就便看东来。我发短信给他，告诉他要去看他。他居然没有在家等我，而是直接赶到会场来看我。晚餐时我们在一桌，他仍谈笑风生。其他学科的学者询问他有关美国史的问题，他不厌其烦地认真解释。如果不是他因化疗少了头发，几乎看不出有何异样。其实他因化疗已不辨滋味，但仍大口吃。到今年2月，剑鸣来电话说东来出现癌症转移，有不虞之虑。我立即打电话过去，他的声音仍很晴朗，平稳。但是他说在腹股沟出现的癌肿很折磨人，体重也降到48公斤。半小时电话，他在最后又提到了即将举办的研讨班。5月2日，临终前几个小时，剑鸣和玉圣去看他，他居然劝他们要注意身体，完全不似临终者那样万念俱灰。他用生命里最后一点气力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何等的博爱胸襟和刚毅气质！

东来走了。留下几部厚重的专题论著，留下200多篇风采卓异的文章和时评，留下他对美国史研究的不懈追求，留下他对研究会工作的关爱，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

2013年9月

## 永远的怀念——悼念东来

王 玮

我与东来师出同门，而且学缘不浅。我们都是杨生茂先生开门弟子，东来是博士生，我是硕士生，层次低了一等。由于年龄上我痴长10余岁，所以每次见面，东来都称我为“师兄”。先生当年经常对我提起东来，言说东来的聪明睿智，才气过人，颇具学术潜力，说话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很为拥有东来这样一个门生感到自豪。我与东来的初次见面是在1989年，当时，杨先生正在筹划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该书是国内首部美国外交通史，规模浩大，内容极丰，体例新颖。先生从各高校延请一些年轻学人加盟，共襄壮举。我有幸名列其中，还有徐国琦，更加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是，先生聘请的名单里，还有东来。我们几人都是

先生的弟子，当然还有北师大的张宏毅老师，以及西北大学的张红路君。在写作启动会上，先生还特意请来了北师大的黄安年老师。张、黄两位先生为该书的写作和美国史研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记得东来那时刚刚应聘到南京大学任教不久，来到天津时，身穿一身飘洒的风衣，讲话很有条理，也有见地，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语速颇快，但口齿清晰，可见东来的敏捷才思，超出常人。讨论中，东来的发言最有说服力，能用最为精炼的语言，把问题的主旨要义一一点出，令人钦佩不已。东来承担的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部分，分量颇大，但是他交稿最早，真正是神来之笔。先生经常以东来为榜样来鞭策我们。先生将该书前半部分的审稿任务交给了我，我发现，东来承担的部分写得相当成熟，他的文笔就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容不得一丝改动。这本著作的问世，东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功不可没。它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一块丰碑，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师兄弟之间的友谊。

这之后，我与东来各居南北，见面机会不多，但是时有书信往来，关键时刻我有事相求，东来总是二话不说，慨然相助。记得那年我们学科点申请博士授权点，我向东来请教学科方向如何设置，东来的一番指点，启发甚大。至今，我们的学科设置仍然沿袭东来当年的指点，毫无变化。我与东来讨论较多的是修订《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事情，这件事是由东来发起的，并且非常主动。他多方联系当年的撰稿人，谋求共识，而且还列出了修订的思路和具体设想，勾画了篇章框架。我曾提议让东来主持这项工作，但是东来坚决不干，他力主仍由杨先生担纲。由于杨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几次推辞，所以此事就搁浅了。杨先生病故后，东来又重提修订一事，其执着之情令人感慨动容。去年5月在上海大学举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4届年会时，我和东来在交通车上并坐在一起，认真讨论了修订事宜。我们都有意继承杨先生的遗愿，把这项艰巨的工作承担下来。但是，不久后就传来东来生病的消息，令我心痛异常。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才俊，正当壮年，怎么会病魔临身呢？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如今，东来突然离我们远去，走得是这样的匆忙，这样的决然，我再也无法重见他的音容，再也不能与师弟共商学术，痛之、憾之，无以排解。谨以此文，寄托深深的哀思。

#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人生——追念好友任东来教授

梁茂信

5月4日送别东来后，在返回长春的路上，我一直都在不停地回忆着与他的交往历程。我们是在1988年8月南开大学举行的美国总统研讨会上认识的。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许多人，其中有杨生茂先生、张友伦先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先生等。在当时认识的青年人中间，还有剑鸣和师兄黄仁伟等人。当时的东来，刚刚获得博士学位。那时我就知道，他也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在那次会议上，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东来，非常开朗，十分健谈，自然成为我们同龄人各类活动的一个中心。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似乎没有烦恼，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当时的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有一个多月，对国内的美史研究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见到东来，还真有一种兴奋、羡慕和佩服的感觉。

与东来第二次的交往是在1990年开封的美国史年会上。在这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刘绪贻、刘祚昌和黄柯可、黄安年等各位先生。在当时的青年才俊中，我还认识了王旭和晓德兄等人。在小组讨论会上，我与东来分别坐在刘绪贻教授两侧。我在小组会上宣读的论文是《美国兼并夏威夷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小组讨论结束后，东来和我交谈，自然对我的文章夸赞了一番。我于是就提出，请他提出批评意见。说一句实在话，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一是因为我的历史基础薄弱，研究功底几乎没有，二是因为自己想考博士，对博士很敬仰，感觉到博士读的书多，知识广博，判断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没想到，东来对我的文章看得认真，大约在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多月，他就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受，对于文章的改进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这件事情让我十分感动。也正是有他和其他学者的意见，那篇文章我经过修改后，发表在1992年第2期的《世界历史》上。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我，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同时，也正是这篇文章，我与东来的友谊，在光阴荏苒中进一步加深。

东来从不摆架子，很是平易近人。所以，在朋友圈子和学生中，有着很好的人缘。我此次到南京为他送行，发现来宾数量之多，确实有点意外。但是，如果从他平时为人处世中表现出的亲和力这个角度考虑，我又感觉到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美史研究会上，总能看到他耐心地与前来讨教的学生交谈。

东来虽然比我小两岁，但是，从大学入学时算起，他又是我的师兄。特别是他在东北师范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曾跟随我的导师丁则民教授学习美国史。后来，当他谈到硕士前与丁老师学习美国史的经历时，显得很自豪，也很享受。最令我难忘的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成专著之后，他特意赠送我一本，还请我提出批评意见。由于我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知

之甚少，何谈批评与高论？我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倒是东来的著作，认真地阅读了一遍，领略了他的研究功力，感觉他的确在其中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当然，在东来的学术生涯中，最令我佩服的是，大约在2000年前后，东来开始研究美国宪政史，他通过多种渠道，采集资料，积极探索，很快成为国内研究美国宪政史成绩最为突出的学者。到目前为止，说他是美国宪政史研究的第一人并不为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所开辟的新研究方向，却因为英年早逝而被打断，这对于中国美国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与东来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是一位自然的人，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型人物，他从来不伪装自己观点。在不久前与到南京大学的几位朋友的交谈中，大家都提到东来的认真、单纯、诚实和一丝不苟的优秀品质。他的这些美好品德同样也表现在他对国内学术腐败和造假的不良风气的关注方面。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就不断地发表文章，对于社会上那些通过种种方式造假，获取文凭的腐败现象，挥笔痛批，不留情面。在2000年以后，他积极地参与到学风建设的事业中，通过自己的研究，示范学术规范，防止更多的青年人出现学术造假或者抄袭的现象。他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和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东来的学术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翻开他的研究成果，我们都会感到十分惊讶，不仅专业性学术成果美不胜收，而且，还有许多是做人、做事、对现实生活有感而发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背后，都表现出他心中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现实关怀。虽然这种现实关怀，是我们当代学者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与东来相比，倍感汗颜。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一个学者所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的重大。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思考和关注焦点仅仅局限于文本的解读和对过去的纯粹性研究方面，还应该站在述往思来的角度，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工作。

有一件事情，我感觉到有些无法释怀的遗憾。我觉得愧对东来。在几年前，我们两人聊天，曾经提到我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让他到东北师范大学主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过去几年间，因为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兑现。去年，我们一起去美国参加美国历史家学会(OAH)年会的时候，又一次提起此事，可是，这次经历却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合作。在东来去年7月份发现病情后，我们还一直在联系，他对病情表现出的乐观和信心，也让我多了几分安慰。甚至在春节期间，我们还通过电邮互相祝福。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听南京大学的好友说，东来一直在与病魔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对生命的渴望，对世间美好生活的留恋，着实让人感动。他在病情不太严重的时候，每逢有人探望时，他仍然是那样的乐观，那样地留恋着养育他的土地，留恋着他的家人和学生。他带给别人的永远是笑容，留给自己的却是无言的痛苦。在我们多年的交往中，他的笑容，好似永不衰败的鲜花。与他的交往，总是一种不尽享受。

东来吾兄，一路走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人生虽然短暂，但是，却书写了不平凡的篇章，相信你的道德文章会激励你的学生，以及未来对学术事业执着追求的晚生，他们会不断地探索，把我们从前辈手中继承的事业，进行到底。

放心吧，东来，一路走好……！

## 天羨英才，东来西去

王立新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当东来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仍然不免异常震惊和悲痛。

我和东来相识是在1987年。我当时在南开跟杨生茂先生读研究生一年级，东来则跟杨先生读博士，有一天他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回来，我和几位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一起与东来在食堂吃饭，听他讲在中心学习的见闻和学术界的动态。当时中国刚开放不久，与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东来有机会在那里学习一年，自是令我们非常羡慕。东来当时讲的什么已记不清了，但东来的口才和博闻给我流下了深刻印象。1988东来毕业后到中美中心任教，我们接触的机会渐渐地少了，但是还是能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见面。当时东来还在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与我的兴趣相近，因此对他的研究极为关注。从2000年前后，东来转向了美国宪政史，我对他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阅读，但东来不时地把他的著作送给我。东来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实现学术转向，并迅速在宪政史领域做出令学界瞩目的成就，我心下甚是叹服。

去年5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上海大学召开年会。东来还是像以前那样意气风发，以他惯有的机智和博学点评会议论文。当时只是觉得他瘦了不少，我问他怎么会消瘦这么多，他解释说可能在美国饮食不习惯导致的。当时也并未在意，只是嘱咐他保重身体。去年9月中旬，剑鸣给我打电话，告知东来罹患淋巴瘤的消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当我知道消息确实无误时，我赶紧给东来写信询问病情，东来回信说已经进行了两个疗程的化疗，准备进行放疗，目前在家休养，除了比较虚弱，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并嘱咐我也已年近半百，要注意身体。去年11月，东来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进行放疗，我和剑鸣去看他。东来在见我们之前还特意洗了一个澡，大概是不希望我们看到他的病容。见面时除觉得他头发剃掉外，并无太大的变化。东来仍旧与我们谈笑风声，话题除了学术动态和学界见闻外，他还与我们聊起对化疗机理的理解和淋巴瘤的分型，对治疗前景非常乐观，甚至计划在接下来的学期回校上课。看到东来心态如此乐观，我心里也好受了许多，觉得东来一

定能战胜病魔。

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不断传来东来病情恶化的消息。进入4月，医生甚至已经告诉家属，东来随时都有危险。听到这些消息后，我还是在心里默默为东来祝福，盼望现代医疗技术能把东来的生命再延续一段时间。4月27日在武汉开会，向陈晓律教授询问东来的病情，感觉东来应该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不想五天后东来即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看着东来瘦弱的身躯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我不禁失声痛哭。

东来聪明、睿智、博学、健谈，是美国史学界罕有的能在美国外交史和国内史两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也是一位难得的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史学家。他不仅在美国史和政治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撰写的大量时评和随笔使他在学术圈外拥有大量读者，这在注重专业化的学术界尤其难能可贵。对东来患病，我一直感到奇怪。东来生活规律，心态乐观，压力不大，且正当盛年，不应该患上这种不治之症。有人说可能与东来频繁搬家有关系，我倒更愿意相信是天美其才，老天爷看中他的惊世才华和生花妙笔，要招他去做侍讲。

东来在患病期间曾梦见天堂，他梦中的天堂与图书馆一般无二。相信东来会在天堂图书馆里，继续以他如椽之笔撰写辉煌的文章。

愿东来在西行的路上平安顺遂！

## 痛悼东来学长

赵学功

从去年下半年就不断听说东来学长患病的消息，但始终坚信一向积极乐观、生活上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他一定能战胜病魔，很快好起来。5月2日晚上8点多，他不幸病逝的噩耗还是传来，真是痛惜万分，那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眠。几天来，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脑海，感慨万千。

任东来教授是已故恩师杨生茂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1988年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是国内美国史研究方向的首位博士，是我的大师兄。虽然我1991年入门时东来学长已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高就，并未有任何交往，但早就熟悉他的大名，并拜读过他发表的一些有关美国史、中美关系史的论文和文章。由他参与编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更是我学习美国外交史的入门书。那时就知道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才俊，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后起之秀。

后来几次一同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慢慢与东来学长熟悉起来，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1998年11月和2008年3月，在东来学长的大力推荐和帮助下，我先后两次到他所

执教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访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由于其特殊的机制，藏书非常丰富，是国内美国问题研究者向往的学术殿堂。第一次访学时间较短，东来学长教学、科研工作非常繁忙，没有来得及多向他请教。第二次访学近三个月，加上也与东来学长熟悉了，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基本上每天都会见面，有时还到他的办公室小坐，谈的大都是南开故事、学术或学界动态。记得刚到中心不久，一个周末的中午，东来学长请河南大学来的一位访问学者和我在中心西侧的一家餐馆吃饭，餐后还亲自驾车带我们游览了几处具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名胜，包括一处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卫南京而牺牲的国民党空军官兵所立的雕塑。在中心期间，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办公室或图书馆看书、写作，虽然习惯了，但还是不免有些枯燥。每每有学术活动，包括他请美国学者讲座、聚餐；或是其学生博士论文答辩，东来学长都会叫上我，以便让我接触和认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其他学者。2008年5月，我们还一同坐火车前往武汉大学，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

东来教授是我一向非常敬重的学长和师友，是一位治学严谨、成就卓然的杰出学者，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是专攻美国外交史，尤以中美关系史见长。专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即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这本专著199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纳入“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外交系列”。这本专著以大量翔实的中美双方原始档案资料为基础，同时旁征博引，参阅的中英文论著达200余种，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援助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代表了国内有关这一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准。

东来学长后来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计划写作“美国宪政历程三部曲”，即《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和《美国宪政的守护神：10位最有影响力大法官的司法人生》。其中前两部已经出版，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具有开创性价值，同样代表了国内目前在这一领域最高的研究水平。这三部曲的完成，必将成为国内美国宪政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东来学长是一位谦谦君子，乐观通达，睿智博学，神采奕奕，且正当盛年，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和丰收季节，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却遭此不幸，英年早逝，怎能不令人痛惜、哀叹。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东来学长的为人为学，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东来学长，一路走好！

# 痛失东来学兄

王晓德

昨日上午参加完任东来教授的追悼会之后返回福州，航班晚点，直到凌晨一点多才回到了家。我在禄口机场呆了将近四个小时，坐在机场的长椅上脑子里老是晃动着东来教授的身影，总是难以相信东来教授离世之事为真。东来教授正是学术研究的正当年华，生活上无任何不良嗜好，竟身患绝症，遽归道山，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世事难料，有谁能想到这样的不幸竟会落到了才华横溢的东来教授的身上。东来教授走了，走向了也许是与故去亲人师友团聚的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把痛苦和遗憾留给了在世的亲朋好友，真是令人痛哉、悲哉、惜哉！

东来教授与我为同门，皆受教于杨生茂先生的门下，从进入杨门的时间上来讲，东来为我师兄，他获得博士学位先于我五年，从年龄上讲，我则长于东来教授五岁，称他为我的学兄乃名实相副。1990年9月，我承蒙业师杨生茂先生不弃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美国外交史的博士学位，此时东来学兄已获得博士学位五年，在国内学术界早就遐迩闻名了。在这五年期间，杨先生竟然没有招到一名博士生，不是无人报名，而是报名者很多，杨先生感到都不大满意，似乎是宁缺毋滥。我后来猜测，东来学兄为杨先生的第一个博士，杨先生在考虑录取博士生时潜意识中会以东来作为参照。东来太优秀了，要是以东来作为录取博士生的标准话，那自然是很难招到非常满意的学生了。我读博士之前在一所很不起眼的地方院校任教，与东来学兄相比，除了在年龄上占取了“优势”之外，学识、外语、风度以及谈吐等方面皆远远落于东来之后。我在读博期间，与东来从未谋面，但杨先生经常提到东来，言语中能够让我感到他为有东来这个学生而骄傲自豪，也常常令我有自愧弗如之感。

我刚入南开大学后不久，有一次到好友李恩民（现为日本一所大学教授）家里做客，恩民拿出东来赠送给他的博士论文《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1937—1946）》让我看，两大油印本，一看就觉得很厚重。我当即向恩民索要，回到宿舍后花了数日功夫拜读完毕。东来的博士论文的确为当时不多见的佳作，严谨的论述、流畅的文笔以及翔实的史料让我佩服不已。那时我对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还处在朦朦胧胧之中，尚未得到学术研究的真谛，东来的论文至少让我有了一个追求的方向。随后不久，我听说东来的博士论文入选了重庆出版社的《中美关系史丛书》，这在当时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顿时让我对东来更增加了钦佩之感。不知何故，这篇非常优秀的博士论文最终未能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实在令人遗憾，直到1995年才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书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凡属下了功夫撰写出的著述，无论问世迟早，必会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东来这部著作出版后

即刻得到了相关专家学者的好评，实不足奇，乃属预料之中的事情了。

我与东来谈不上有深交，我在南开大学读博期间，他早已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教了。我获得博士学位留在了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工作，很长时间在学术交往上局限于中国拉美史学界，几乎不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和相关专题研讨会，这样也就失去了与东来交往的机会。不过，我们毕竟为同门师兄弟，在学术研究上必然会相互关注。我与东来都是攻读美国外交史研究方向的博士，他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上起步要比我早得多，尤其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上成就颇丰。我虽然很长时间必须把我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拉丁美洲的现状问题，但从来不愿意放弃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这样我与东来只要一见面就很容易在学术探讨上找到共同的话题。2000年之后我所在的拉美研究中心归属到历史学院，我把研究美国外交史作为了研究的重点，经常参加国内举行的美国史学术讨论会，与东来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在学术讨论会上，我特别愿意听东来的点评，他旁征博引，角度独特，总是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学术讨论之余，我也找时间与东来聊天，东来往往是侃侃而谈，很有激情，知识面非常广，对国外的学术研究动向了如指掌，在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上非常有见地，让我从中受益匪浅。2008年11月上旬，我应蔡佳禾教授之邀到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做一讲座，遇见东来，东来邀我到他办公室聊天，赠送给我他新近出版的两本有关美国宪政史的著述。他非常关心我主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史》丛书的进展情况，提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建议。我做讲座时，东来从头至尾听到底，还就讲座的一些问题与我在现场交换了看法，令我至今还是感念不已。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于2012年在上海召开了年会，我因有事未能与会，失去了向东来请教的机会。2010年我与东来在厦门年会上见面，之后我俩再也没有相遇。东来患病，我得知后惊愕不已，作为同门，理应到南京探视，我亦有此打算，但听好友说，东来不愿意外地朋友来宁，那样会增加他的痛苦，我想还是东来不愿意让朋友们为他徒增麻烦，浪费时间。到了此种地步，东来还是为他人考虑，此乃东来之为人的真实写照也。

东来为一纯粹书生，有才、有义、有情，他的离世为学界的一大损失，给友人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东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和家庭生活的美满，足可让他的人生熠熠生辉。谨以此小文作为对东来学兄的缅怀，东来学兄千古！

2013年5月5日于福州寓所

# 怀念东来

赵梅

今天是向东来遗体告别的日子，每每想到还有几个小时东来就将永远离开我们了，心如刀绞，辗转反侧，泪如泉涌。凌晨起身写下这段文字，以表哀思。

我和东来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记不清是在哪一年、哪种场合认识相识的了。逢年过节，我们几乎记不起相互问候，但每次见面、写邮件都很亲，心很近，好像是省了客套话的家人、兄妹。

东来一直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无论他身在美国还是在南京，时常写邮件给我，分享在美的感受、点评我写的和编辑的文章的看法，非常直言。记得他告诉我，他偶然在女儿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发现我是作者之一，很高兴，觉得参与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撰写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他觉得我所撰写的美国历史部分，内容比以前好多了，但语言还可改得再通俗简约些，以适应高中生阅读。他读到韩铁教授发表在《美国研究》上的《美国法律史研究中有关私人产权的几个问题》，他觉得无论是选题、分析论述，还是材料运用上，这篇文章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少见的好文章。我知道东来与韩铁教授师出同门，所以把他的评价以匿名读者来信的形式转给韩铁教授。《美国研究》上也曾发表过质量不太高的文章，东来写信给我，坦率提出批评，毫不留情。

他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近年来，他致力于美国宪政史研究，为《美国研究》撰写、审阅并推荐了不少好文章。他很忙，但每每我想到好题目，向他约稿，或是请他匿名评审杂志来稿，他都欣然答应。最近一次是在美国所建所30年时，我以编辑部的名义请他写纪念文章，回忆他在美国所读书的日子。他写下了《结缘美国所》，文中谈到的百家当年考美国所研究生落榜这段往事，后来在会上成为佳话，百家的发言便由此谈起。

最后一次见到东来，是去年11月他来北京做化疗期间，我去北京肿瘤医院看他。那时，他已做完了三次化疗。虽然因为化疗，头发掉了，有些消瘦，但他精神很好，很健谈。他送我刚出版的《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一书，并签字留念。他对我说：“知道你来了，没什么礼物送给你，送你这本刚出版的我和学生写的书。”我送他去火车站回南京，临别时嘱咐他好好养病，改天去南京看他。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东来安息！天堂没有痛苦！我将永远怀念你。来世我们还做好朋友。

东来夫人吴老师及家人节哀并保重！

笔于2013年5月4日晨

# 东来同学留给我的印象

石庆环

东来病逝的消息，我还是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塞姆·C·皮尔森那儿得知的。由于最近没有经常浏览学会网站，加之自己的雅虎邮箱不大好用而改使网易信箱，所以5月2日学会登出的东来逝世的消息，我也未能及时查收到。正巧那天晚上7点半左右（美国早晨时间），我收到了皮尔森教授从美国发来的信，他告知东来已辞世。为了进一步确认消息，我又联系了王旭教授。当得知确切信息后，我既惊愕又感伤。15个月前，我丈夫任爽教授（从事唐史研究）没有走完一个甲子轮回就匆匆离去，我还没有完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却又听到了东来辞世的噩耗，真有雪上加霜之感。我为东来的英年早逝而惋惜，也非常同情和理解东来家人此时此刻的心境。因为我和女儿都曾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可以说感同身受。所以，惟望他们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得知东来离世消息当晚，我又与东来的一位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七八级同学（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李晓菊教授）聊了一会儿，她也为东来的早逝而伤痛。他们俩是当时七八级中年龄最小的，又都是聪明绝顶的“小神童”。与李晓菊教授的通话，也把东来最早留给我的印象回溯到三十几年前的大学时代。那时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的本科生，东来是七八级学生。我们虽相差一个年级，但实际上他们入学只比我们晚半年，所以七七和七八级同学都比较熟。东来在七八级同学中非常出众，他不仅年龄最小，长得比较单薄，一眼就能看出是江南人，而且聪明、好学、兴趣广泛。与现在的学生不同，我们大学的生活比较单调，除了学习以外，就是系里周末组织放映一场电影。每次放映电影东来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仅很早就到教室，而且还帮助放映老师忙前忙后，并时不时地给大家讲些什么，看上去非常活跃。所以，从那时起东来就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大学毕业后很多年，我并没有见到东来，后来是通过上面提到的皮尔森教授（当时他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与东来在电话里聊了几次，直到近十几年在美国史学会年会上，我才见到东来本人。再见到东来，除了感到他进一步博学和成熟以外，其他方面变化不是很大，他还是那样聪明睿智，充满青春与活力。

可如今，这位才华横溢和事业如日中天的东来老同学却已驾鹤西去，怎能不令我神伤与悲悯！

东来同学安息吧！

2013年5月5日于沈阳

# 沉痛哀悼任东来教授

孙群郎

前天从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邮件惊悉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病逝，我不禁惊呼，我怀疑我的眼睛，我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忙叫我爱人来一起看邮件。不幸的是，这确实是真的！顿时，一股悲凉之气、哀痛之情禁不住涌上心头。两天来，任东来老师的音容笑貌几乎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两天来，我一页书未读，一个字未写。就是呆呆的，心里悲凉着，伤痛着！

我与任老师交往并不是很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极为深刻。我最早与任老师交往还是在 2001 年到南京大学作博士后，我是慕名前去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去拜访他的。第二次是 2003 年我博士后出站时，任老师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在答辩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任老师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的风范。别的老师都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但也不免一些溢美之词。而任东来老师没有溢美，没有虚饰，但十分中肯，非常负责。任老师对我的出站报告读得最仔细，最认真，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进行修改的，给我提出了最多的宝贵意见。其中有一个问题给我印象最深，就是关于郊区的化粪池问题。在此之前，本人没有到过美国，搞美国史研究就如同隔岸观火，雾里看花，而任老师曾多次赴美研究考察，对美国有切身的感受。他仔细地给我解释了化粪池的结构、使用之类的问题。由于任老师的认真指导，我纠正了出站报告中的大量错误，也就是避免了后来的拙书《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中的更多错误和纰漏之处。我是任老师的受惠者之一，对此，我对他十分感念，本人在拙书的后记中也曾对此表示感谢。然而，通过此次交往，任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治学严谨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热情待人的胸怀。

任东来老师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知识渊博，成果丰硕，为人耿直，热情开朗。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一大损失。

我很悲痛，既为任老师的英年早逝，也为了我们这个群体！

任老师，你安息吧！您的成就和您的治学精神，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世学者！

2013 年 5 月 5 日

# 任东来教授与美国史研究会

韩宇

我是2012年8月得知任东来教授罹患癌症的消息的。8月11日，任东来教授发来邮件告知“发现患上了T细胞鼻型淋巴瘤。发现及时，属于早期。目前刚刚结束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副作用还好。目前已回家休息。前后至少要六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月）。由于癌症是个慢性病，需要较长的治疗时间和修养，所以未来的一年前，学会的事情不能关注了。”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惊，5月的上海年会上还是活力四射、满面春风的任东来教授怎么会成为癌症患者！在深感惋惜的同时，我从内心深处衷心希望东来教授能够逢凶化吉、早日康复。万万没有想到，今年的5月2日，任东来教授便离我们而去了。

任东来教授很早便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建立了联系。翻开秘书处武汉大学时期已经泛黄的会员登记表，我很快找到了他本人填写的表格。申请表编号228号，填表时间是1982年9月13日，当时任东来教授刚刚从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我大致翻阅了同时期申请入会者的表格，在“曾发表过什么著作、译作及论文”一栏中，大多数都是空白。而任东来已经与他人合译过《对不断变化的美国革命的评论》、《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历史译丛》第一期），并在《世界历史》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对1812年英美战争的新解释》。1984年，年仅23岁的任东来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最年轻的会员之一。1990年在开封和郑州召开的第六届年会上选举产生的第五届理事会中，出现了四位不到40岁的年轻人，包括王旭、黄仁伟、李剑鸣和任东来，出生于1961年的任东来还不到30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任东来教授年纪轻轻便当选学会理事，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我仔细翻阅了研究会早期的材料，发现入会之后，他便积极参加学会活动并献言献策。1986年4月出版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第33期在刊首刊发了任东来写给研究会秘书长刘绪贻教授的一封信，现抄录如下：

刘先生，您好：

最近一期《通报》所载“设想”及丁先生信，均很有启发。作为会员，我和其他一些年轻同志受惠不少，贡献无多，也在此提几点建议，供您参考。

（一）北图所编《美国书目》极有价值，但所收书籍仅限于1979年之前入藏。而近几年正是开放时期，进书尤多，学会可否与北图合作，资助增编《美国书目》。

（二）《美国译丛》已出了十期，可否在此基础上再加选择，结集公开出版，与《美国史论文集》一样，逐步形成系列。

(三)除了丁先生提出与美国史学组织建立联系外,似也应该邀请港台学者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建立固定联系,这也有助于祖国统一事业。

研究会成立六年多,成绩有目共睹。如果说以前我们主要是“对内搞活”(加强国内本学科学术联系),现在似可以进一步“对外开放”了,不仅对国外、港台学者开放,而且也应该对国内其他美国研究学科开放,进而促进学会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敬颂

春安

后辈 东来

4.10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入会不久的任东来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学会发展,他所提出的建议即使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熠熠生辉的真知灼见。毫不夸大地讲,加强与国外、港台学者以及其他学科的联系的建议对研究会今后的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2002年,已经在理事会任职12年的任东来教授在西安举办的第十届年会上担任副理事长,当时他才41岁。正是在那届年会上,理事会决定将秘书处从南开大学迁往厦门大学,我开始做秘书处工作。自此,我与任东来教授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任东来教授是给秘书处提意见最多的会员,没有“之一”。秘书处发出征求意见的邮件后,任东来教授几乎每次都第一个回复,而且每封邮件都有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对我们的工作助益颇多。东来教授还常常主动向秘书处提出好的建议,比如厦门年会之后,他发来邮件,“会议相当成功。谢谢你们的辛苦。另外,理事会选举历年都是头痛的问题,今年的程序很好。秘书处最好整理一个文字材料,作为一个选举程序规定,为以后的选举提供方便。”上海年会召开之前,任东来教授提出建议,“不要(按)专业来分组,而是按照某些主题来确定讨论小组,像美国各种历史学会做的。鼓励个人或小组提出主题 panel,有三篇文章就可以成为一个 panel。目前清华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以及首师大世界史年会也是如此,这样的好处是打破专业界限,也避免论资排辈。因为这次会议筹备得早,会员有充沛的时间提出自己感兴趣的 panel。”王希教授也曾提出同样的看法,于是秘书处在上海年会采取了按主题分组的国际通行做法,这也是我会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秘书处的请求,东来教授更是有求必应。厦门年会和上海年会的开幕式上,任东来教授反应机敏,妙语如珠,他的成功主持使会议大为增色。当我为寻找闭幕式论文点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东来教授慨然应允。2012年是我会奠基人之一丁则民教授逝世十周年,秘书处组织专栏纪念。任东来教授本科时期曾就教于丁老师门下,我便去信邀稿。东来教授在2011年12月1日的回信干脆利落,“好的。我一定写。截止日期?”当我转年去信询问,东来

教授在 2012 年 2 月 1 日的邮件这样回复，“真不好意思，假期一直懒洋洋的，没有动笔。1 月 22 日来美国 GRINNELL College 作一个学期的研究，才安顿下来。我周末前一定给你。”果然，周五便收到了他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东来教授当时很可能已经染病在身，尽管身体不适、事务缠身，他还是积极支持秘书处的工作，实在令人感动。事实上，研究会的每项重大活动，东来教授都积极参与。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研究会网站和通讯的每个专栏几乎都有东来教授的大作，有纪念逝去的前辈学者的“杨生茂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为师”、“冬日那温暖的阳光：怀念恩师丁则民教授”、“冯承柏教授：一个永远追求新知的学者”，也有为研究会奠基人贺寿的“像刘绪贻先生那样生活”、“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九十华诞”等等，文笔生动，内容丰满，皆为此类文章之上品。想到今后再也读不到东来教授的鲜活文字，心中顿生悲戚之情。

任东来教授对美国史研究会成长壮大的贡献远不局限于此，上述内容只是我本人的亲身体会。正如研究会的唁函所言，任东来教授“为我会的组织发展、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对外联系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任东来教授的逝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相信，心系学会、无私奉献、功绩卓著的任东来教授将永远留存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全体会员的集体记忆。

# 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

——青年学者任东来教授访谈录

胡晓进

**采访时间：**2006年9月2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F110 室任东来教授工作室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胡晓进，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本访谈录已经任东来教授审正）

**问：**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 90 华诞。杨先生不仅是杰出的学者和教授，而且还是《历史教学》唯一健在的创办人。而你是杨先生培养出来的国内第一位美国史研究的博士，所以，就让我们的访谈从杨先生对你的影响开始。你觉得杨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杨先生是我硕士、博士时期的导师。读硕士时，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杨先生是那里的兼职教授，我一年只能见他几次，向他求教大多靠频繁的通信。1985 年硕士毕业后，我到南开念博士。博士毕业我去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美中心）任教，旋即又以国内访问学者身份回南开工作半年，参与杨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写作。与杨先生在一起的两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向他求教，每次的谈话都在一小时以上。前不久，在纪念杨先生 90 华诞的庆贺会上，美国外交史专家华庆昭教授曾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向杨先生求学的经历，特别谈到了这种非正式的学习对他的帮助，对此，我深有同感。杨先生对新知的了解与掌握，对学术的认真和专注，对祖国富强昌盛的期盼，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学生的平等与宽厚，对名利的淡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让我受益无穷。透过他的言传身教，我看到了一种真正学者的精神气与敬业精神。从他那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学者何为的道理。

**问：**从 1978 年到 1988 年，你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南开大学，连续读完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其间你还在南京大学中美中心研修过一年。这个学习经历，挺让人羡慕的，而不像很多人那样，一个学校读到底。现在，很多人批评国内研究生培养中的“近亲繁殖”，那么，你是否觉得四所大学的学习经历各有其长处？另外，你常常把 1992-1993 年在海外的留学经历也看作是自己的学生生涯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

**答：**我自己不是“近亲繁殖”的产物，所以没有亲身的体会，不好置评。不过，我觉得体验多样性毕竟是一个愉快的过程，求新是人的本性。现在回想起来，我求学的四所学府的确有着不同的风格。东北师大是典型的中国式严格教育，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是北大式自由、

开放的培养，南开求学是英国式一对一的导师制熏陶，中美中心则是重阅读、重考试的美国式训练。

严格地说，我的学生时代到 1988 年博士毕业时就结束了。但是，1992-1993 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一边做研究，一边认真地参与了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的“美国外交史”和威廉·洛克腾堡（William E. Leuchtenburg）的“美国现代史”两个研究生讨论班。两位教授教学风格各有千秋，但都是采取专题讨论的形式。在组织课堂讨论时，他们不仅能把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还能把相关的学术史交代得清清楚楚；既有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也有现在历史学家与过去历史学家的对话。在这一年的学习中，我不仅阅读了大量美国学者的探究著作，而且还专门去了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个总统图书馆查阅中美关系的档案。此外，我还学会了组织讨论班的一些基本方法。

**问：**你的学习经历确实很丰富，这应该为你的学术研究生涯打下较好基础。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表学术文章的呢？

**答：**我第一篇见诸出版物的东西，是本科期间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补白，关于美国学界对 1832 年美英战争的新看法，是从英文著述中编译的。第一篇发表的学术文章是《罗斯福与雅尔塔协定》，它以来稿摘登的形式发表在《世界史研究动态》上。第一篇完整发表的论文是《租借援助与美蒋矛盾》，是我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历史教学》1985 年第 12 期。

这些学生时代的习作，很不起眼，但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开始摸到了学术研究的门路。首先是注意学术界的最新发展和前人的研究，其次，注意从第一手文献入手。早在做《1832 年英国议会改革》的本科毕业论文时，我发现各种中文资料上有关选民财产资格的说法不一。于是，就去查阅道格拉斯主编的《英国历史文件》中的改革法案的原文，发现这些中文书上的记载全部有误。写《罗斯福与雅尔塔协定》时，我也同时使用了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雅尔塔会议文件集和原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针对学界一味批评罗斯福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出卖中国利益的说法，指出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的做法固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也难辞其咎，因为档案文献表明，蒋介石几次向罗斯福表明，他希望罗斯福出面，代表中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表示愿意作出一些牺牲。当然，罗斯福后来在秘密协定中所作出的让步，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允许的范围。

**问：**中美关系史是你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也是你成为学者的开始。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2003 年 3 期），有一篇关于抗战期间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综述，赞扬你 1995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选题和论述“别具一格”。我想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你从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并选择抗战期间美援这个题目？

**答：**我博士论文虽然 1995 年才出版，但早在 1988 年就完成了。一项研究在 18 年以后还

能够被人提起，自然是高兴的事。至于为什么选择研究中美关系史，原因比较简单，就是要让博士论文所依据的资料，能够超过美国同行。你知道，杨先生的专长是美国外交史，因此，我选择外交史作为研究方向也就顺理成章。杨先生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他非常希望中国学者也能写出一流的美国外交史论文。但是，历史学论文的水平，特别是像博士论文这样的实证研究，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利用材料的丰富性与稀缺性。如果选择美国外交史的一般性题目，在语言能力和材料的收集上，中国学者很难与美国本土学者平起平坐。那么，中国学者怎样才能扬长避短呢？一个办法就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中美双边关系上，这样不仅能够利用美国的材料，也可以充分挖掘中国的档案资料。

至于为什么选择抗战期间的中美关系，也还是出于资料上的考虑。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失败，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为此，美国国务院的历史学家在编辑 1940 年代卷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时，中国部分占了很大比重，文献非常丰富。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与 1949 年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类似，就是要说明，美国援华已经尽力，蒋介石政府的失败，主要是他们自身的原因。

如果只是利用这些美国材料，你的研究根本没有办法超过美国人。因为他们同时还发掘了大量没有整理出版的档案和国务院以外的文献。对我来说，幸运的是，1980 年代台湾陆续出版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这套书中的《战时外交》，是在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断交的背景下推出的，收集整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的对美外交档案。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对《中美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批评的回应，试图说明美国对国民党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两相对照，能避免不少偏见与误解，基本上可以写出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故事”。就像跳探戈舞一样，外交史所探讨的交涉过程，必须有来有往观照双方，才能恢复历史的真相。此外，1930 年代末的中美贷款谈判，也有较充分的史料，在美国有《摩根索日记》，在中国有孟默然从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辑录的《美蒋勾结史料》。

有了这些基本史料后，我又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收集了一些材料。在查找 1943 年“中美新约”的谈判记录时，馆员却给我拿来了一大摞 1946 年“中美商约”的档案。我一看，手就抖了，原来这是整个十几次谈判过程的全套记录，因为当时谈判的工作语言是英文，所以记录也全都是英文档案，有关人员也就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让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这个发现令我惊喜不已，因为即使在档案收录和编辑相当完整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对于这个谈判，也只有存目，没有内容。据此，我写成了《试论 1946 年中美商约》一文。该文的价值就是突破了原来学界对中美商约视为“卖国条约”的政治性论断，而是用扎实的原始文献，通过研究具体的谈判过程和双方的讨价还价，揭示美国以推行战后贸易自由主义为由，对中国战后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种种干预，以及中国谈判者为维护国家权益所做

出的苦苦努力，最终用客观的结论代替政治化的定论。该文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一篇主要基于中国档案写成的中美关系史论文。

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当充分，较好的一本是美国学者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他利用的美国文献自然比我多，不过，他看到的最重要的英文文献我也能看到。而我所利用的中文文献，他则根本不知道。所以，至少在文献的发掘上，他的研究就不如我。《历史研究》那篇述评，认为我从美援看中美同盟这一角度很好，实际上，我最得意的还是中英文史料的交叉和对照使用。

中美关系领域中，我最满意的研究不是这篇博士论文，而是十年后完成的《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中美白银外交这个题目，著名学者汪熙、二档馆原馆员郑会欣先生都做过很好的研究。我之所以敢下笔，也是因为我找到了新的材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它收录、翻译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英文档案。其中有当时驻美公使施肇基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来往电文。以前研究中美关系的外交史学者没有注意到这套书，而金融史学者则对这一时期美国的白银购买政策缺少了解。我将货币史与外交史这两方面的中英文资料结合起来，所以较好地恢复了历史的全貌。

从中国的政治外交史来看，白银外交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和 1935 年中国成功的币制改革，以及后来的美国援华抗日联系在一起。从美国政治外交史来看，它是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外交决策的典型。为了争取美国西部产银州国会议员对其新政立法的支持，罗斯福同意通过 1934 年购银法。这个法律本来是美国国内政治妥协的产物，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被迫加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中，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大量购银导致国际银价狂涨，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一场金融紧缩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促使下，中国最后决定加速推行其酝酿已久的币制改革计划，放弃银本位，建立起现代的、容易管理的货币制度。在稳定货币以及走向币制改革的努力中，积弱的中国不得不寻求列强的支持。于是，由美国内政造成的白银问题在演变为中国的财政危机之后，又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美、英、日为控制中国的货币财政进行了一场暗中较量。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白银交涉集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诸问题于一体，最典型地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因此，我在结论中认为：“30 年代中美白银外交可以说是以闹剧的形式在美国开场，以悲剧的形式在中国展开，最后以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形式在两国关系的互动中结束。”

这篇文章的贡献不仅在于资料上独树一帜，分析上细致入微，而且，它的结论部分也比较突出。出色的历史研究，既要能钻进去，还要能跳出来。钻进去，是说要有坚实的史料，争取穷尽所有的资料，这是历史学的生命；跳出来，就是如何从个案的研究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或结论，这需要一定的理论功底和跨学科联想。因此，我试图从比较现代化和

民国历史国际化两方面，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对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假说，即激进的依附论和主流的自由主义发展论，美国学者柯恩的“中国中心论”和科伟林的外国“刺穿”中国说，提出质疑；强调中国既可能会因为卷入国际市场而受损，同样也可以通过正确和巧妙的外交而获益；决定中国命运的更多地取决于中外因素的互动而非某个单一的力量。

**问：**除了这些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你还专门写过考证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和其他军事机构的文章。一般认为，考证文章是中国史学者的专利，世界史学者很少写这样的文章，你为什么 would 做这样的文章？

**答：**考订史料是历史学者的基本功，不论是治中国史还是治世界史。世界史学者很少做考证性的文章，主要是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较少，过多地利用外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编纂好的文件资料集。如果依靠第一手的文献，有时就不得不作考订的工作。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内战期间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并不陌生。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影视作品，常常出现美军顾问团团长沙大维少将为蒋介石政府出谋划策的形象。可是，细究起来，顾问团何时成立？构成如何？人员多少？功能何在？没有一本书能够告诉读者。各辞书中有关顾问团的条目解释不一，有的书甚至记载该团人数最多时达到一万，并指挥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样的一个问题自然值得弄清楚。国内学者谈及顾问团时，基本的资料都是来自翻译成中文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但这些资料无法回答上述疑问，也得出顾问团参与指挥进攻解放区的结论。

因此，要能清楚这个问题，唯有去美国档案馆查阅美国陆军部的档案。1994年4—7月，我有机会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冷战史项目研究员，为此专门去该馆查阅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档案，搜集了从建立顾问团最初的计划书，到中美两国就顾问团条约的谈判，再到顾问团发给美国陆军部的定期月报，我终于发现了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比如，中国学者在谈论中美有关美军顾问团的协议时，都是根据王铁崖教授编辑的那本《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它译自国民党外交部英文抄本。但是，王铁崖教授注意到，该协议没有签订日期，因此，他在附注中指出：“本协定签订日期未查明，据《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可能为1946年4月29日。”但事实是，这个协定从来就没有签订！这一点《白皮书》也提到了，并解释说“原因是[美国政府]向国会递交的有关法案未获通过”。但我的考证却是，没有相关立法也可以在总统的战争权下面签订协定。而且，构成顾问团基础的国会援华立法之所以成为废案，是因为面对中国全面内战业已爆发的紧张形势，来华调处的马歇尔无意推动这个立法，同时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形势下，签订顾问团协定，担心引发中国人民的反感，加强蒋介石集团的内战决心。

马歇尔使华初期，曾经对顾问团寄予很大希望。因为1946年2月国共两党达成《整军协定》后，马歇尔希望建立军校，由美军顾问来训练教导中国的军官，让军队国家化。中国内

战全面爆发后，这个设想成为了泡影，马歇尔对顾问团的兴趣大减。但他又不愿意像从中国华北撤出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样，撤出顾问团，于是这个顾问团就以缩水的形式存在于中国，从事一些培训军官、监督援华物资的非作战工作。对此，蒋介石非常不满意。1947年末，经过蒋介石的一再要求，美国政府才允许顾问团团长沙大维，在“非正式和秘密的基础上”向蒋介石本人提供一些作战建议，但是，马歇尔还告诫巴大维，这只是他团长的个人行为，而不是整个顾问团的工作。

美军陆军顾问团是1946年10月28日在南京成立的，其编制只有750人；而海军顾问团是在此前一个月（9月30日）成立的，正式名称是“海军顾问团调查组”，300人左右的规模，主要业务是在青岛帮助国民党海军使用美国转让给中国的军舰。这两个顾问团在1948年9月17日组建为“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其编制为1000人。可笑的是，就在第二天，顾问团就开始了从中国撤出的工作。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发现，美国1941-1949年在华的军事机构众多，名称也一再改变，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相当混乱。于是，以顾问团研究为契机，我按军种逐项考察这些部队和机构在中国的沿革变化，写出了《1941-1949年美国在华军事机构及其沿革》的考证性文章，为研究中美关系和军事史的学者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问：**除了这些考订工作外，你在1990年代还进入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这就是评价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从史料考订到理论评介，好像是一种很大的跳跃，你如何有这样的转向？

**答：**表面上看，从外交史的史料考订到理论评介，是一个不小的转变。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既需要作微观的研究，也应该有些宏观的研究和思考。虽然我本人没有能力从事宏观研究，但至少可以关注美国学者的宏观研究，并在弄懂吃透之后，介绍给国内的学术界。这是我写作《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霸权稳定论》的初衷。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中，不管你喜欢与否，霸权和霸权国对于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稳定至关重要。这一理论最早源于国际经济学者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研究，后来被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接受并发展。在西方学者那里，“霸权”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领导权，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么多的贬义。因为我们有反霸的传统，因此，一见到霸权稳定论就觉得它是为争霸张目。但在批判任何一种理论之前，你至少要弄清楚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基本构成和条件限制。这就是我研究“稳定论”的动机。

实际上，吉尔平提出的“霸权稳定论”，主要是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角度来论述的，强调它只是限于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一个信奉自由贸易原则的霸主国的存在，是这一经济秩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还需要两个补充条件：其一是大国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二，主要大国在这方面有广泛的共识。就这样，霸

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构成了国际自由市场体系的三个前提。联系二战后六十年没有再出现 1929 年那样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能不说这一理论没有现实根据。

写完“霸权稳定论”后我又发现，这一理论与国际制度、国际体制理论紧密相关，“霸权稳定论”可以说是国际制度理论的一个部分。吉尔平强调霸权建立制度，导致国际稳定；反对者、相互依赖理论范式的提出者罗伯特·基欧汉则认为，美国霸权衰落后，国际稳定依然可以靠国际制度来维系，因此，他突出制度而非大国的作用。为弄清这一问题，我又写了一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制理论》。在研究国际制度理论时，有两个英文词“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体制）和“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很相似，常常混用。为了探讨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与理论渊源，我拿出自己历史学者的考证功夫，对它们产生的理论背景进行细致的梳理。这就是《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一文。这几篇论文都是介绍和评价美国学者的论述，没有多少原创性。其价值只是在于，比较早和比较准确地将美国学者的新理论介绍给国内学界。

**问：**这几篇文章让你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也有了一定影响。我的疑惑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当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门“显学”，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身其中的时候，你却没有“更上一层楼”，而是急流勇退，又开始去美国宪政领域中“探险”，并和朋友一起出版了颇受读者欢迎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这次转向，的确有些“探险”的味道。从美国外交史转到国际关系理论，总还是有些联系，况且我也受过系统的训练。而宪法宪政领域，特别是美国宪法，专业很强，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宪法学者和美国史学者，很少有人去研究美国宪法史。我的转向，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我感到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我们只能介绍西方的东西，不要说自己提不出理论，就连用经验研究，甚至是用中国案例的经验研究来验证西方的理论都做不到，因为国内资料 and 数据的收集太难了，我也没有做这样调研所必需的科研经费；客观上，在学科归属上，我一直是散兵游勇，先是挂靠在历史系的国际关系史。2000 年，又转到了该系的世界史学科，所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再是正途。

这时候，中国留美学者王希（现在是北大的长江讲座教授），送我他刚刚出版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拜读之后，收获很多，觉得这一领域大有探讨的余地。接着，2000 年美国大选难产，最高法院的判决一锤定音，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法治的权威。多年来对美国的观察和研究，促使我思考美国繁荣强盛的本质，或许宪政是一个根本的因素。就这样，我翻检出 1984 年读硕士时，杨先生指导下写的第一篇习作“美国早期宪政史上的联邦法令废止权”，加以修改补充，发表在《美国研究》2001 年第 2 期。此时距离该文最初完成已经整整 17 年了！

从 1950 年代沃伦法院以来，美国最高法院越来越多地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成为美

国宪政史上“最积极”的法院。由此引发了美国法学、政治和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研究和激烈辩论，相关成果汗牛充栋。作为外国学者，我们只能望其项背。也就是说，我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出像中美关系史研究中那样原创性成果，我只能在国内的学术参照系中做得最好，同时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分享美国的法治经验。为此，我和我的旅美朋友陈伟等人选择以案说法的形式，来讲述美国宪政的发展，结果大获成功，仅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学者所撰写的书评就有十几种之多。

当然，该书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读书界对宪法和法律知识的广泛需求。但我们的确花了很多的功夫。不仅认真研读了大量外国文献，而且在写作上也很费心思。国内大部分法律著述极为枯燥乏味，而外国史的研究著述也很少能够生动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鲜活的人物，自然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我们明确一点，要熔学术著述的准确性和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于一体。既要有基本制度的介绍，又要有人的活动；既要有宏观历史的观照，又要有具体的情节，甚至是悬念。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接手的案件通常都有一定的戏剧性和复杂性。为此，我确定了三个写作原则：第一，以案说法，法在案中；第二，以事说理，理在事中；第三，词章并茂，雅俗共赏。当然，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从纸面上的宪法文本，到现实中的宪政制度和生活中的宪法诉讼，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美国的法治建设，不仅仅有赖于那些法律精英：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执法者，而且还离不开无数的芸芸众生、那些被压迫者、被歧视者、甚至是罪犯为自己宪法权利的苦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美国的宪法史，正是这些勇敢的小人物不懈地争取自己权利和寻求社会正义的历史。

**问：**《美国宪政历程》所反映的写作风格，似乎与你为大众媒体写作评论密切相关。在学术性写作之外，你为什么还花不少时间去做这些不能够被数目化为你工作量的工作？我还想知道你是如何平衡和协调学者和评论员这两种不同的角色？我知道，在美国有专门的公共史学和公共史学家，我们国内也有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争论。你又是如何看待历史著作、历史学者的公共性问题？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来进行评论；其次，我写评论不是逮啥写啥，都是评论我比较熟悉的领域，一是虽然不在专业之内，但却是学术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比如我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和评价数据规范》以及它的衍生物《高校文科学报编辑规范》中注释规定的批评；二是我专业研究可以涵盖或延伸的问题，比如给通俗性报刊撰写的有关美国内政外交的时事评论。

如果从研究生时代发表书评算起，我撰写学术评论有年头了。但写国际评论却是最近五年的事，这跟我1999年在美国第三次做访问学者有关。当时我去的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接待我的是戴维·兰普顿教授。他是该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此前他还担任过很

长一段时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像很多美国学者一样，兰普顿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书斋里，而是积极参与“上传下达”的政策咨询和分析工作，也就是既参与一些思想库，如尼克松中心的政策研究，又在大众媒体上向民众解释或评论中美关系或中国事务的新发展和新问题。我们原来只注意他们眼睛向上的“智囊”作用，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眼睛向下的“辅导员”作用。实际上，他们也承认美国学界的“智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极为有限，相对来说，面向民众的工作影响可能更大。这一观察让我意识到，虽然在中国的国情下，学者根本没有渠道去影响政府，如果想做“智囊”的话，就应该像资中筠教授在《美国研究》创刊号上所指出的那样，做“全民族的智囊”。因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公众面对的国际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庞杂，学者有义务参与进来，为他们提供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的观察角度、历史背景和结构框架。

就这样，2000年初回国后，我尝试着利用自己的专长，撰写国际评论，最初是投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议题集中在中美关系，大体是每月一篇。其中一篇《中美关系：脆弱而有韧性》，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中美关系中脆弱的一面，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两国在全球安全、地区稳定和经济贸易中的广泛和深入的共同利益。该文被内地《长江日报》转载并拿去参评“中国国际新闻奖”，竟然获了个评论类三等奖。这个意外之奖是对我写作国际评论的一个肯定。2001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应《南方都市报》之约，我写了一篇《小视角下的大历史：中美关系中的两个23年》的整版评论，通过对比分析中美建交前后两个23年里地区环境和两国现实的巨大不同，来阐明中美关系的积极价值。我敢说，从这种角度切入的评论，也只有历史学者才会想到。这篇评论，社会反应不错。于是，编辑就要我给他们写美国评论专栏，每星期一篇，坚持了四年之久，直到今年报纸改版。我以学者的立场与知识来写评论文章，目的是要把学者的研究化为老百姓可以看得见、看得懂的东西。所以就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挖掘时事背后的历史与制度背景，必须写得有深度。当然，在这里，我的角色已不再是学者，而是观察者、评论者。这种角色转换，也让我体会到以知识服务大众的乐趣。

公共历史学（public history）的概念，在国内还是新生事物。它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那个时候，像我们今天一样，历史学博士生招得太多，导致博士过剩，传统的就业岗位——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本无法容纳。很多博士只好到博物馆、档案馆、展览馆、国家公园等机构就业，从事非学术性的历史教育和普及工作。学院派历史学家看不起他们的工作，而他们也认为现存的历史学会充满了学究气，没有满足人们对历史知识的渴望，于是，这些人便打出了公共历史学的旗号，突出自己是面向大众、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历史学家。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哈佛大学历史系外交史教授欧涅斯特·梅（Ernest R. May）也支持他们的工作，并撰写了《过去的教训：美国外交政策中对历史的应用和误用》这样的公共历史

著述。这些学者并没有因为离开象牙之塔而一蹶不振，恰恰相反，他们发现了一个服务于大众和社会的新天地。过去十年，美国电视业中一个异军突起的频道就是“历史频道”，这是公共历史学成功的一大标志。显然，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极大，否则，国内戏说、胡说历史的作品也就不会流行。因此，国内的历史学者应该主动站出来，向美国的公共历史学家学习，用准确而又生动的历史作品来占据公共历史的舞台。国内一些敏锐的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我的同行李剑鸣教授最近就写了一篇令人深省的文章：“通俗历史，何以职业史家缺位？”

中国目前还没有公共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但不能说没有公共历史学家。此外，学院里的职业历史学家，如果有很好的写作能力，就不应该放弃参与公共历史的写作。在写作《美国宪政历程》时，我就试图以公共历史学的方式，扩大读者对象，促进专业历史知识的传播。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归纳为公共历史学的作品。

**问：**虽然说《美国宪政历程》可以看作是公共历史学的作品，但你本人的教授职位，注定是一位学院派历史学者。作为教授，你到中美中心已经工作 18 年。在这一期间，你一面给中美中心的美国学生教授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历史，一面在南京大学讲授美国历史，以此来帮助两国青年的相互了解。对于这样的一种跨文化教学和交流，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

**答：**我的教学工作确实有点特殊，与众不同。我的教学生涯是从给国际学生，主要是美国学生上课开始的。由于汉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要让他们在纯汉语的环境中，学习中美关系，的确有很大的难度。对我的教学也是一个挑战，它逼着我去思考，如何用最简洁的语言，去表达并不简单的思想和观念；如何不拘泥于历史的细节，同时又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如何深入浅出，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讲清楚。这样的教学活动实际上也有积极的方面，比如影响到我浅白的写作风格。从知识的掌握程度上讲，国际学生可能不如中国学生，但在批判性思考上，中国学生则稍显逊色。国际学生眼中根本没有权威的概念，对任何的观念、任何的理论假设，他们都会提出质疑，这也不断促使我思考一些既成东西。

以我所讲的中美关系史为例，我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他们从美国的角度质疑，常常迫使我进行换位思考。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文化扩张，传教士要把中国基督教化。这个评论总体不错。但很多受美国教会派遣来的传教士，都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在中国办学校、开诊所医院、发行出版报刊、设立孤儿院等慈善机构，而不是办教会。我们一般都认为，他们是以此为掩护，目的还是让人们改信基督教。但在国际学生看来，传教士的这些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基督教文化虽然以信仰为核心，但范围却相当广泛，兴学助教，救死扶伤，助残携幼，都是基督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活动并非幌子，它们与基督教精神融为一体。

在给南大的中国学生讲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时，我也以自己在中美中心与美国教授、同

学交往的亲身经历，提醒他们要换位思考。国际之间的不信任与冲突，虽然主要是源于国家利益与安全上的固有矛盾，但是，与文化之间的相互隔膜也密切相关。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有助于中外学生之间的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宽容。这也是我十分热爱这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既然谈到你对中美两国青年一代讲授历史的经历，那就让我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历史教学问题，不过是中学历史教学。你的女儿去年在美国读了一年高中，现在她又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你作为父亲和历史学者，肯定注意到了她的历史学习。透过她在中美两国高中学习历史的经历，你怎样看待中国的中学历史教学？

**答：**严格说来，我没有资格对中学历史教学评头论足。不过，这一问题让我产生了一段愉快的回忆。24年前，我曾经在东北师大附中实习一个月，讲的几节课是关于斯巴达克起义。我至今记得，指导我的附中老师一再告诫我，上课时要用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多用生动的事例，少用抽象的概念。显然，她深得历史教学的真谛。培根说过，“历史是用事例讲授的哲学”。离开了生动的故事，历史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也就不再成为历史。以此观之，目前高中的历史教材，不是按照历史特有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来编写，而是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专题史，似乎并不恰当。尽管初中阶段已经学过了简明通史，但这依然不足以成为让高中历史“碎片化”的理由。要避免重复，应当可以用其他的办法。“碎片化”的专题史或许适合大学高年级的历史教学，但绝不适合高中生。我非常赞成任世江先生对新课标教材的论断：“新教材不仅内容多而新，而且专业化、成人化倾向更严重！”

目前我只看到我女儿手中《高中历史 I》（人教版），也就是政治专题史。应该说，编者的确下很多功夫。图文并茂，形式多样，比我当年的课本好多了。但是，大概是为了满足新课标的要求，充斥了太多的内容，特别是复杂、抽象和有争议的概念，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阅读的快乐。这本并不厚的教材，几乎穷尽了历史上主要的政治制度、国家形态和国际格局，从秦汉专制到辛亥革命，从《南京条约》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雅典民主到近代代议制民主，从罗马法到美国宪法，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世界格局的多级化。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不仅概念过多，而且充满跳跃性。而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其连贯性和故事性。我想即使再好的历史教师，也无法在短短的一学期里，让孩子消化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让历史继续成为记忆的学问，而非思考的学问。

对于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孩子在学校接受的历史教育，最终会影响到他对世界、国家和人生的基本看法，这也是历史这一看似无用的人文教育的重要所在。确定一项切合实际的新课标，编写几种适合中学使用的教材，需要花大力气。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似乎可以参照。本来，像美国这样权力极端分散、教育管理基本上属于地方事务的国家，联邦政府一直对各州的历史教学不管不问。但从1980年代开始，在历史学各个

专业组织的呼吁下，联邦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拨出专款，组织上百位有广泛代表性的历史学者和教育专家，五易其稿，在 1994 年制订出一套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并据此编写出一批教材、多卷本历史文献集和百科全书以及网络版史料库。我女儿在美国高中用的美国历史课本，就是根据这个标准编纂出来的。课本内容相当丰富，篇幅也远远超过了我们中国的课本。但是，因为文笔生动有趣，内容与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学生基本上可以作为课外读本自行阅读。这就减轻了老师的授课压力，他可以针对孩子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重点的讲解。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女儿带回来的历史作业，居然是一些需要分析的历史文件，比如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当然，这个老师比较特别，要求太严。我女儿说，所有的同学都觉得太难了，有时候只能瞎写。但这说明，这位美国老师的确注意带领孩子进入历史的场景，培养孩子的分析能力。真正想办法让历史成为思考的学问，而不是记忆的学问。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中学的历史课本写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我女儿的美国史课本已经把 1990 年代克林顿的绯闻案写了进去，这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仔细琢磨，却会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历史的界定往往取决于读者对象。克林顿绯闻案发生在我们所亲身经历的年代，对我们来说，可能不算是历史；可对今天的中学生来说，案发时他们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没有记事，这就成为了历史。从历史写作的角度来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就个体经历而言，当代历史对不同年龄的人，其终点是不一样的。十几年前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历史，对小孩子来说，却是历史；五十年前的东西，对我父母来说，不是历史，可对我们来说，是历史。所以，中学历史教材的终点应该比大学的教材更靠后。

载自《历史教学》（高校版）2006 年第 12 期

# 任东来教授著述目录

## 一、著作

### 1. 专著

-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参与撰写第 8-10 章），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任东来等著：《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陈永祥主编：《布什与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三章、附录二及核校附录三）；
- 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 年；
- 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年；
- 任东来著：《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任东来著：《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任东来、胡晓进等著：《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
- 任东来、胡晓进、江振春、颜廷等著：《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 陈晓律、任东来等编著：《世界历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 江振春、任东来著：《比登天还难的控枪路——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 2. 译著

- [美]罗伯特·舒尔茨辛格著：《外交博士基辛格》，任东来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
- [英]安德鲁·甘布尔著：《政治和命运》，胡晓进等译，任东来校，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 [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著：《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美]戴维·奥布赖恩著：《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胡晓进译，任东来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 [美]马克·图什内特著：《反对有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著名异议》，胡晓进译，任东来、任裕海校，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 [美]杰弗里·罗森著：《最民主的部门——美国最高法院的贡献》，胡晓进译，任东来校，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 3. 电子音像

任东来、陈伟、白雪峰著：《美国宪政历程》，阿柯、晟焕播音，中国文采声像出版公司 2012 年。

## 二、论文

东来：《对 1812 年美英战争起因的探讨》，《世界历史》1981 年第 5 期；

任东来：《重复出版劳民伤财》，《读书》1983 年第 12 期；

任东来：《罗斯福与雅尔塔协定》，《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5 期；

陈其广、任东来：《社会科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要准确、适量、注重社会效果》，《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85 年第 3 期；

任东来：《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与美蒋矛盾（1942—1944）》，《历史教学》1985 年第 12 期；

任东来：《汉密尔顿——美国早期杰出的政治家》，《人物》1986 年第 1 期；

东来：《“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沪召开》，《历史教学》1986 年第 5 期；

任东来：《1979 年以来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1986 年第 12 期；

东来：《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读书》1988 年第 1 期；

任东来：《评美国对华军事“租借”援助（1941-1946）》，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 2 辑），重庆出版社 1988 年；

阿瑟·N. 杨格、任东来、李安山：《1941-1945 年外国对中国的援助》，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迈克尔·沙勒、熊京民、任东来和王冠华：《柯乐布、戴维斯与 1949—1950 年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新近公开的文件及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沃伦·J. 科恩、任东来：《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任东来：《试论一九四六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任东来：《英美两党制的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0 年第 3 期；

任东来：《现代化理论评介》，《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0 年第 6 期；

任东来：《围绕美国贷款展开的中美外交（1939-1940）》，《南京大学学报》1990 年第 5 期；

任东来：《美国外交史教学研究参考文献综述》（上、下），《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5期、第6期；

任东来：《美国为什么会在中国失败？——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6期；

罗伯特·H. 弗雷尔、任东来、吴耘：《杜鲁门的历史地位》，《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9期；

任东来：《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放弃（1942—1943）》，《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

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上、下），《兰州学刊》1991年1期、2期；

罗伯特·舒尔茨辛格、吴耘、任东来：《略论基辛格的外交》，《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3期；

任东来：《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与“霸权稳定论”——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6期；

戴维·S. 帕特森、任东来：《美国国务院外交史编辑室及其工作》，《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8期；

伯恩德·格雷纳、孙庆、任东来：《古巴导弹危机的再思考——采访谢尔吉·米高扬》，《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12期；

任东来：《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外交与皖南事变》，《安徽史学》1992年第1期；

任东来：《美国、中国与1955年万隆会议》，载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现代出版社1992年；

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任东来：《漫谈诺贝尔和平奖》，《国际展望》1994年第1期；

任东来：《诺贝尔和平奖宣布仪式亲历记》，《科技文萃》1994年第1期；

任东来：《美国总统图书馆散记》，《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3期；

任东来：《中美两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4年第4期；

任东来：《冷战后东亚地区集体安全体制初探》，《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4年第6期；

任东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亲历记》，《国际展望》1994年第8期；

任东来：《1940年蒋介石拟向美国出租台湾、海南的文件与说明》，《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任东来：《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任东来：《美国国家档案馆研究记》，《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

东来：《后来居下》，《读书》1995年第5期；

任东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理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6期；

任东来：《杰弗逊故居散记》，《美国大观》1995年第6期；

东来：《“女权”与新闻》，《读书》1995年第9期；

任东来：《“肯定性行动”与美国政治》，《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1期；

任东来：《略论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任东来：《凯南的遏制思想与美国的遏制战略——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读后》，《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任东来：《形成中的美日轴心及其对东亚的影响》，《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任东来：《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任东来：《作为冷战历史的战后美国外交——略评〈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任东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定时炸弹——从美国加州大学废除“照顾措施”谈起》，《国际展望》1996年第6期；

东来：《Ethnicity（族性）——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读书》1996年第8期；

任东来：《美国与1944年美苏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

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与中美桐油、滇锡贷款》，《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任东来：《自决原则在历史上的实践及其含义的演变》，《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3期；

任东来：《通向中美抗日同盟》，载仝晰纲等主编《史学研究新视野》，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张振江、东来：《谨防傲慢》，《读书》1997年第3期；

东来：《“黑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读书》1997年第4期；

任东来：《朱瀛泉著〈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任东来：《7月1日，全世界只有香港》，《华人时刊》1997年11期；

东来：《从遏制到合作》，《读书》1997年12期；

任东来：《从好奇到关心，从不太了解到真诚欢迎——港人大“炒”驻港部队》，《华人时刊》1997年13期；

东来：《由富到强——大国的成长之路》，《世界知识》1998年第18期；

东来：《探索东亚的国际关系》，《世界知识》1998年第22期；

任东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体制理论》，《欧洲》1999年第2期；

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读书》1999年第12期；

任东来：《在学术批评中确立学术规范》，《学术界》2000年第3期；

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张振江、任东来：《冷战后审视欧洲统一的新视角——评介古索〈20世纪的欧洲统一：阅读精粹〉》，《欧洲》2000年第3期；

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看法和政策的演变》，《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

东来：《新版美国历史学会〈历史著述指南〉介绍》，《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

东来：《自决权的三种形式》，《读书》2000年第7期；

任东来：《从“〈读书〉奖”事件看理性的重要性》，《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9期；

任东来：《除去总统神秘的光环——美国记者伍德沃德及其新著》，《世界知识》2000年第14期；

任东来：《美国宪政史上的“麦考洛诉马里兰州”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

任东来：《美国早期宪政史上的联邦法令废止权》，《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任东来：《学术批评为何不署本名》，《学术界》2001年第2期；

东来：《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钥匙——〈美国对外关系大全〉简介》，《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任东来：《作为冷战历史的战后外交——略评〈战后美国外交史〉》，载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史学新书评 1996-1997》，社科文献 2001年；

任东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中的台湾问题》，载阎学通、孙雪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 2001年；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欧洲》2001年第3期；

任东来：《全球历史观——谁影响谁》，《学术界》2001年第3期；

任东来：《从城市化到都市区化——评王旭的〈美国城市史〉》，《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

任东来：《也谈核心期刊、专家审稿及其他》，《学术界》2001年第4期；

任东来、杨玉圣：《切实重视翻译质量》，《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东来：《了解美国——读者的常识理性和学者的“科学结论”》，《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

任东来、墨儒思、孔博：《摸着石头过河——中美学者谈中美关系》，《世界知识》2001年第8期；

Ren Donglai, “A Response to Andrew A. Latham: From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to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Geopolitical Strategy,” *Asian Affairs*, Vol. 28, No. 3 (Fall, 2001);

任东来：《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世界知识》2001年第11期；

任东来：《脆弱而有韧性——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世界知识》2001年第12期；

任东来：《让学术界瞩目〈学术界〉》，《学术界》2002年第1期；

东来：《自吹自擂与学者的职业道德》，《博览群书》2002年第1期；

任东来：《美国最高法院刍议》，《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任东来：《探求中美关系的历史谜底——评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

任东来：《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

东来：《纪念一项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读书》2002年第4期；

任东来：《美国乔治·布什总统访问南京大学记略》，载高澎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东来：《历史学家的责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学术界》2002年第5期；

任东来：《学术期刊的注释标准——兼谈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的干预》，《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

任东来：《学术注释规范与国家权力——再与周祥森先生讨论》，《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

任东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注释规范？》，《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9期；

任东来：《一份特别的贺礼〈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序》，《博览群书》2002年第10期；

任东来：《核心期刊无可奈何的功能误用》，《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11期；

任东来：《核心期刊幼稚病》，《出版广角》2002年第12期；

任东来：《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

胡晓进、任东来：《探索美国对外关系的宪政源泉——读路易斯·亨金的〈对外事务与美国宪法〉》，《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

任东来：《1941—1949年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机构及其沿革》，《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任东来：《美国对台湾地位问题的立场——也谈“认识到”和“承认”》，《开放时代》2003年第1期；

东来：《寻求画中的真历史》，《博览群书》2003年第2期；

胡晓进、任东来：《保守理念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1889—1937年的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

任东来：《国际政治术语的误区》，《看世界》2003年第2期；

任东来：《从负责的公民到负责的全球公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任东来：《白银外交和币制改革：绝处逢生的“双赢”游戏》，《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尊重学术敬重学者——写在〈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面世之际》，《学术界》2003年第3期；

东来：《对社群概念的进一步讨论——与许纪霖先生对话》，《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后记——记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学术界》2003年第4期；

任东来：《漫谈美国的宪法与宪政》，《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4期；

任东来：《〈政治和命运〉中译本絮语》，《博览群书》2003年第6期；

任东来：《有那么一点儿科学，又不那么科学的科学》，《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7期；

胡晓进、任东来：《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对外事务权之争》，载孙哲主编：《美国国会研究Ⅱ》，2003年；

任东来：《一部书四分之一个世纪三代人》，《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李学勤、王义遒、任东来：《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科技文萃》2003年第10期；

东来：《凭什么独立的法官比民选政客更有权威》，《读书》2003年第10期；

任东来：《帝王总统小布什》，《领导文萃》2003年第11期；

任东来：《想象“西方”》，《南风窗》2003年第12期；

陈伟、任东来：《吉迪恩：一位改写美国司法制度的小人物》，《法学家茶座》（第4辑），2003年；

塞缪尔 皮尔逊、任东来：《18世纪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美国思想形成的影响》，《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

任东来：《裹小脚、隆乳术和多元文化》，《东西南北》2004年第2期；

任东来：《国际问题研究论文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形式》，《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

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

任东来：《中俄秘档里的朝鲜战争》，《领导文萃》2004年第4期；

任东来：《卡扎菲——革命者的急转弯》，《领导文萃》2004年第4期；

任东来：《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关于美国媒体的诽谤诉讼》，《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塞缪尔 皮尔逊、刘华、任东来：《美国宪政的主要思想渊源》，《人大法律评论》2004年第6辑；

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8期；

任东来：《强国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学习月刊》2004年第10期；

任东来：《克林顿的政治人生与性格缺陷》，《领导文萃》2004年第11期；

任东来：《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

任东来：《公有制与英国工党的沉浮》，《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

任东来：《裹小脚与隆乳术》，《散文百家(杂文)》2004年第20期；

任东来：《美国公民：不太热衷“选总统”？》，《南风窗》2004年第22期；

任东来：《学术批评与学术界人际关系网络——以苗怀明与吕小蓬的“抄袭案”争议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期；

储昭根、任东来：《美欧分歧与“适应霸权”——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评介》，《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

刘慧英、任东来：《能动还是克制：一场尚无结果的美国司法辩论——评〈司法能动主义〉》，《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

任东来：《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

东来：《宪法应该神圣，但更应该实用和好用》，《法学家茶座》（第8辑），2005年；

任东来：《当代西方研究：宪政制度与当代美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胡晓进、任东来：《联邦最高法院与现代美国公司的成长》，《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威廉·安德森、任东来：《美国政府监管程序的宪法基础》，《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胡晓进、任东来：《宪法与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社会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评介》，《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

任东来：《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任东来：《一本民众的经典〈美国最高法院〉译后》，《博览群书》2005年第7期；

桑福德·列文森、任东来：《法治的理想和法治实践的限度——〈美国最高法院〉中文版序言》，《博览群书》2005年第7期；

任东来：《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任东来：《有趣又益智的文明之旅》，《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

任东来：《改变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脚注》，《读书》2005年第9期；

任东来、白雪峰：《当自由遇到“生命”的时候》，《法学家茶座》（第9辑），2005年；

任东来、翟艳芳：《〈美国法律辞典及其中译本评介〉》，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刘慧英、任东来：《能动还是克制：一场尚无结果的美国司法辩论——评〈司法能动主义〉》，《美国研究》2005年第12期；

任东来：《美国总统大还是最高法院大？——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律师文摘》2005 年第 5 辑；

马庆株、任东来、贺卫方、龙卫球等：《从沈履伟案学术批评与法院判决》，《科学中国人》2005 年第 11 期；

东来：《宪法也可以可爱可亲》，《书摘》2006 年第 2 期；

任东来：《〈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的前言后语》，《书屋》2006 年第 6 期；

任东来、胡晓进：《学术世界中的无限乐趣——青年学者任东来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6 年第 12 期；

任东来：《塔夫脱与美国最高法院办公楼的建设》，《法学家茶座》（第 12 辑），2006 年；

任东来：《盟友之间霸权和平转移的实证研究〈从英镑到美元〉序》，《博览群书》2007 年第 1 期；

任东来：《当代西方研究：美国权力的悖论·主持人语》，《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任东来：《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凯利 伊顿、安德鲁 韦德曼、任东来：《伊拉克战争与“布什原则”的命运》，《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任东来：《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司法审查》，《美国研究》2007 年第 2 期；

任东来：《寻找另一个中美关系——华人在美国》，《书屋》2007 年第 2 期；

胡美、任东来：《1946—1947 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美国研究》2007 年第 3 期；

任东来：《“反多数难题”不是一个难题》，《博览群书》2007 年第 4 期；

胡晓进、任东来：《自由与“生命”的取舍》，《书屋》2007 年第 4 期；

任东来：《华人在美国的历史》，《书摘》2007 年第 5 期；

任东来：《言论自由与诽谤罪》，《书屋》2007 年第 8 期；

任东来：《小人物情书中的插图史》，《博览群书》2007 年第 10 期；

刘慧英、任东来：《美国最高法院的“奥林匹斯山神”——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上、下），《法学家茶座》（第 13 辑、第 14 辑），2007 年；

任东来：《罗杰 坦尼——美国毁誉参半的首席大法官》，《法学家茶座》（第 17 辑），2007 年；

任东来：《作为技艺的法律实践和作为学问的法学研究》，《律师文摘》2007 年第五辑“卷首语”；

任东来：《还司法神殿以平常——〈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评介》，《美国研究》2008 年第 1 期；

任东来：《马歇尔和坦尼——晚年相似的悲哀》，《法学家茶座》（第18辑），2007年；

任东来：《当代西方研究：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主持人语》，《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威廉·R·安德森、颜廷、任东来：《美国〈信息公开法〉略论》，《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东来：《“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读书》2008年第4期；

任东来：《美国个税：艰难的“割肉”》，《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05期；

颜廷、任东来：《美国新闻出版自由与国家安全——以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研究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6期；

任东来：《冯承柏教授——一个永远追求新知的学者》，冯承柏教授纪念集编委会编：《春四秋怀故人——冯承柏教授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任东来：《203年的加薪争议》，《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9期；

任东来：《〈五月花号公约〉：美利坚的神话》，《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8期；

任东来、朱静静：《自由卫士——雨果·L.布莱克大法官》，《法学家茶座》（第21辑），2008年；

任东来、程法华：《瑟古德·马歇尔的故事》，《法学家茶座》（第24辑），2008年；

任东来、颜廷：《探究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根源——美国学界几种司法审查理论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任东来：《北约60年》，《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4期；

任东来：《星条旗保护焚烧它的人》，《学习博览》2009年第6期；

东来、江振春：《从“持枪权”看美国宪法的解释》，《读书》2009年第8期；

江振春、任东来：《浅析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2期；

任东来：《中国学者对冷战“其他问题”的研究——对夏亚峰教授文章的补充》，《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李丹、张庆熠、任东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制度》，《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冯东兴、任东来：《1958年中国从朝鲜撤军与中美外交交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任东来：《美国劳工寻求社会公正之路》，《改革内参》2010年第10期；

任东来：《所得税：穷人对富人的战争》，《看历史》2010年11期；

任东来、刘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中的英美因素》，《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

任东来：《结缘美国所》，《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哈利·T.狄金森、胡琦、任东来：《现代英国宪法：改进或颠覆？》，《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任东来：《司法和法官独立的美国之路》，《看历史》2011年第6期；

张庆熠、任东来：《美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法院的角色——读〈美国宪政民主下的司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

李丹、任东来：《霍姆斯、查菲与言论自由的审查标准》，《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2年第1期；

李丹、任东来：《马歇尔大法官与杰斐逊总统的恩怨——点评〈杰斐逊全传〉中的一段历史公案》，《学术界》2012年第1期；

任东来：《冷战史中的苏联解体》，《学习博览》2012年第1期；

江振春、任东来：《持枪权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和吸纳》，《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布莱恩·E.亚当斯、王娟娟、荣霞、任东来：《美国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自治》，《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李丹、任东来：《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读迈克尔·尤罗夫斯基、保尔·芬克尔曼〈自由之路——美国宪政史〉》，《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2期；

任东来：《美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论》，《南开学报》2012年第3期；

任东来：《像刘绪贻先生那样生活》，《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亦见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祝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

任东来：《神秘的“偶西”——祝贺曹德谦先生九十华诞》，杨玉圣、孙洁琼编：《书生志业——曹德谦先生九十华诞祝贺文集》，2012年；

李丹、任东来：《马歇尔大法官与杰斐逊总统的一段公案》，《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

东来、江振春：《持枪权的全国化与美国联邦制》，《学术界》2012年第7期；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世纪中国》2006年6月21日；亦见《怀念李慎之》，香港泰德时代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任东来：《不是吾师，胜似吾师——祝贺邓蜀生九十华诞》，黄安年主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

胡晓进、东来：《威廉·伦奎斯特——壮志未酬身先死》，《法学家茶座》（第37辑），2012年；

### 三、报纸专栏

任东来：《两个36的启示》，《联合早报》2000年12月19日；

任东来：《美国对伊动武意味着什么？》，2002年9月29日；

任东来：《从美国准备天花疫苗谈起》，《南方都市报》2002年10月7日；

任东来：《布什的反恐战争和减税计划》，《南方都市报》2003年1月12日；

任东来：《对自由永无止境的追问和追求》，金羊网—《新快报》2003年1月16日；

任东来：《美国式的“倾斜”政策》，《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9日；

任东来：《究竟是谁不识时务？》，《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16日；

任东来：《从“9·11”事件疑犯被定罪入狱谈起》，《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23日；

任东来：《从布什讲话看美国的思想库》，《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2日；

任东来：《海湾美军中的“娘子军”》，《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9日；

任东来：《中美恩怨1943》，《南方周末》2003年3月20日；

任东来：《美国工作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南方都市报》2003年5月11日；

任东来：《布什与国会的减税之争》，《南方都市报》2003年5月25日；

任东来：《由“9·11”恐怖分子被定罪想到的》，《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8日；

任东来：《布什会遭遇“伊拉克门”吗？》，《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15日；

任东来：《关塔那摩的幽灵》，《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22日；

任东来：《领导人私谊与美英特殊关系》，《南方都市报》2003年6月29日；

任东来：《利比里亚内战与美国的无动于衷》，《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6日；

任东来：《危险的外交暗杀》，《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20日；

任东来：《〈爱国法〉“合法”吗？》，《南方都市报》2003年8月3日；

任东来：《如此法治国家》，《南方都市报》2003年8月10日；

任东来：《施瓦辛格参选与美国政治传统》，《南方都市报》2003年8月17日；

任东来：《〈十诫〉的神圣和法治的严肃》，《南方都市报》2003年8月24日；

任东来：《布什伊拉克政策的两难处境》，《南方都市报》2003年8月31日；

任东来：《在拯救生命与保护专利之间》，《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7日；

任东来：《美国在伊背上沉重负担——帝国扩张陷入财政泥潭》，《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14日；

任东来：《“占领逻辑”VS“解放逻辑”》，《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21日；

任东来：《布什联大讲话要点——美化对伊战争抬高联合国》，《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28日；

任东来：《布什竞选战略——后发制人》，《南方都市报》2003年10月19日；

任东来：《美国的国际“化缘会”何以成功？》，《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2日；

任东来：《对历史类比的思考》，《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9日；

任东来：《美政治万花筒中的同性婚姻》，《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23日；

任东来：《美国政治第一秀》，《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30日；

任东来：《美国的北约》，《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7日；

任东来：《布什心满意足之年》，《新京报》2003年12月21日（地球周刊 2003风云大片）；

任东来：《〈爱国法〉中的陷阱》，《新京报》2004年2月1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美国兵当选〈时代〉风云人物的联想》，《南方都市报》2004年1月11日；

任东来：《单极好，还是多极好》，《新京报》2004年2月8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海地的混乱》，《新京报》2004年2月29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金钱的政治》，《新京报》2004年3月14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学生时代的读书记忆》，《南方周末》2004年3月11日；

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24日；

任东来：《无神论者挑战美国法律》，《新京报》2004年3月28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名不实的北约》，《新京报》2004年4月4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北约大举东扩已“名不副实”——俄罗斯该怎么办？》，《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4日；

任东来：《“法盲”首相小泉》，《新京报》2004年4月11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亚洲美元忧思录》，《新京报》2004年4月18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布什的麻烦与美国的民意》，《新京报》2004年4月25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美国的尚武与克里的尴尬》，《新京报》2004年5月2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从布什道歉看媒体影响》，《新京报》2004年5月9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两种意义上的“珍珠港”》，《新京报》2004年5月23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移权撤军可否并行？》，《新京报》2004年5月30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里根——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新京报》2004年6月13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美国总统的身前任后》，《新京报》2004年6月27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法治的无奈与精彩》，《新京报》2004年7月4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法律之战无穷期》，《新京报》2004年7月11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情报门尘埃落定》，《新京报》2004年7月18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美利坚帝国”与“美利坚警察国家”》，《新京报》2004年7月25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9·11”事件调查中的问责制》，《新京报》2004年8月1日（地球周刊 评论）；

任东来：《尤科斯跷跷板》，《南方都市报》2004年8月8日；

任东来：《共和党大会的“嗅觉”与“秀术”》，《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5日；

任东来：《枪的政治自由的代价》，《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9日；

任东来：《事与愿违的袭击与绑架》，《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26日；

任东来：《电视辩论的意义》，《南方都市报》2004年10月17日；

任东来：《流感疫苗与大选政治》，《南方都市报》2004年10月24日；

任东来：《大选难题：投票率过低》，《南方都市报》2004年10月31日；

任东来：《美国大选的道德解读》，《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7日；

任东来：《阿拉法特——在革命者和政治家之间》，《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14日；

任东来：《鲍威尔以德服人》，《厦门日报》2004年11月17日；

任东来：《从布什政府阁员请辞说起》，《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21日；

任东来：《选举不是儿戏，是游戏》，《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28日；

任东来：《增兵伊拉克与坦克保护下的选举》，《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5日；

任东来：《布什坐了一把过山车》，《新京报》2004年12月26日（地球周刊 国际风云（述评篇））；

任东来：《令人惊骇的总统就职演说》，《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23日；

任东来：《布什政府的“隐性宣传”》，《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20日；

任东来：《凯南——一位被误解的智者》，《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27日；

任东来：《生命的无奈与法治的胜利》，《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3日；

任东来：《生命的另一种意义》，《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10日；

任东来：《美国官场与军队文官制度》，《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17日；

任东来：《博尔顿：联合国越来越远？》，《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24日；

任东来：《深喉故事背后的商业利益争夺》，《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2日；

任东来：《奥康纳的地位及继任者》，《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10日；

任东来：《罗伯茨的路还长着呢！》，《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31日；

任东来：《罗伯茨的“坦白交代”》，《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7日；

任东来：《大法官遭遇法律“盲点”》，《新京报》2005年8月14日；

任东来：《罗伯茨背负骂名》，《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14日；

任东来：《法官的职责与不明智的判决》，《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28日；

任东来：《罗伯茨的新机会》，《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1日；

任东来：《伯南克——布什的又一个“棋子”》，《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30日；

任东来：《除了胜利，布什还能说什么》，《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4日；

任东来：《布什保卫白宫反击战初战告捷》，《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25日；

任东来：《女总统带来重建的曙光》，《南方都市报》2006年1月22日；

任东来：《切尼打猎伤人的新闻追踪》，《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19日；  
任东来：《哈佛校长萨默斯的悲剧》，《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26日；  
任东来：《美国州政府何以叫板白宫》，《环球》杂志2006年8月23日；  
任东来：《宪法法和宪法学之辨》，《法制早报》2006年12月10日；  
任东来：《美国缘何会有“伟大社会”构想》，中国日报网2007年3月22日；  
任东来：《女师傅的丈夫叫师爹？》，《南方周末》2008年7月3日；  
任东来：《听“奥奶奶”讲法治的故事》，《南方周末》2008年9月25日（阅读）；  
任东来：《一场打了两百年的言论自由保卫战》，《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2日（书评）；  
任东来：《权利是争取来的》，《东方早报》2010年9月26日（书评）；  
任东来：《老人司法——总统也奈何不得》，《东方早报》2010年5月9日（书评）；  
任东来：《冷战史中的苏联解体》，《东方早报》2011年10月23日（书评）；  
任东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24日（法律之声栏目）；

#### 四、思想网、学术批评网等专栏文章

任东来：《宪政、市场、移民——美国的强国之本》，思想网专栏2005年6月11日；  
任东来：《美国的拆迁征地官司》，思想网专栏2005年6月29日；  
任东来：《从布什诉戈尔的法律诉讼看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思想网专栏2005年9月20日；  
任东来：《从胚胎干细胞资助之争看美国联邦与州的关系》，思想网专栏2006年8月1日；  
任东来：《大国责任与国际组织》，思想网专栏2006年7月7日；  
任东来：《美国劳工寻求社会公正的艰难之路》，思想网专栏2007年3月10日；  
任东来：《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思想网专栏2013年4月8日；  
任东来：《学术腐败的“中国特色”》，学术批评网2008年9月14日；  
任东来：《杨生茂先生的为人、为学和为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  
任东来：《言者无罪》，学术批评网2011年2月21日；  
任东来：《冬日里那温暖的阳光——怀念恩师丁则民教授》，学术批评网2012年2月29日。

## 唁 函

### 苏州大学世界史学科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并转南京大学任东来治丧委员会：

惊悉我会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我们感到痛惜万分！东来西去，我们过早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学长，真挚的同仁和可爱的朋友。在此，谨向秘书处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请向南京大学治丧委员会转达我们全体世界史学科同仁的深切悼念之情。

苏州大学世界史学科全体同仁

### 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转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的消息，我们无比悲痛。他的去世，不仅使得中国美国史研究界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学者，更使得我们失去了一位长久以来让我们受益良多的师友。

希望任东来教授家属节哀。

东来教授千古！

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全体同仁

### 我会顾问华庆昭研究员唁函

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任东来教授不幸英年早逝，谨致以沉痛哀悼，并向家属转致诚挚的慰问。我与任教授在南开相识多年，如今白发人送了黑发人，真是可悲。

华庆昭 拜上 2013年5月2日

### 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惊闻任东来教授仙游，这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多年好友，令人十分痛心。请代我向他的夫人转达我沉痛的悼念。

刘绪贻

## 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并转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惊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十分悲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即在《世界史研究动态》等刊物上读到过署名“东来”的文章，深为文章新颖的观点和资料所吸引。后来在我跨入美国史学界后得知此“东来”即任东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和任东来教授接触并不多，只是在几次会议上见过面，他儒雅的风度、不俗的谈吐、睿智的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任东来教授正值壮年，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正是他多年学术积累喷薄而出的时候，却不幸英年早逝，这不仅使他人生的道路就此中断，使他难以再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难以再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美国史学界的每位同仁都为此悲痛不已。但愿任东来教授在天国得享人世间难得的福乐。

任东来教授安息吧。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白建才

2013年5月2日

## 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唁函

秘书处及各位同仁：

惊闻东来师兄离去，甚感哀痛。自他患病后，我一直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他积极治疗，争取早日战胜病魔。上月中去南京，听闻他痛苦难忍，坚持去看望他，并祈求他能够闯过难关。回来后也一直默默地为他祈祷。三天前还和嫂子吴老师短信联系，希望多鼓励东来师兄。没想到，他就这么快走了。当然，离去也是对难忍之痛苦的解脱，愿他一路走好！

暨南大学 陈奕平

## 辽宁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南京大学治丧委员会：

惊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任东来不幸病逝的噩耗，我们十分悲痛。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此，请允许我们代表辽宁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院的全体师生，向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南京大学治丧委员会并通过你们向任东来教授的亲属表示沉痛的悼念与慰问！

辽宁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2013年5月2日晚10时40分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唁函

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

惊闻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深感痛惜。

任东来教授是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勤奋耕耘，著述颇丰，在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备受学界推重，在美国宪政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更是独树一帜。任东来教授不仅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和论文，还撰写了数量可观的评论文章，观点新锐、风采卓异。

任东来教授是我会较早的会员，积极参与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不吝献言献策。自2002年以来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为我会的组织发展、人才培养、学术创新、对外联系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任东来教授的逝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在此哀伤时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全体会员向任教授家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望节哀顺变。

任东来教授永垂不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3年5月3日

## 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唁函

秘书处：

今天下午，我和杨玉圣教授一同到南京鼓楼医院探望任东来教授，和他做了简短交谈，还照了合影。当时他精力不佳，言语吃力，但意识正常，思路清楚，叮嘱我们保重身体。我从南京返京，路上手机断电；刚进家门，即得知东来仙游，短短几个小时就已天人永隔，真是痛彻肺腑。愿东来一路走好，并转嫂夫人吴耘节哀。

李剑鸣

## 王希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旭教授：

今天早晨从理事会邮件中得知任东来教授去世的消息，甚为震惊和悲痛。一年前我们还一同参加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会，在密尔沃基畅谈他的研究计划，并一同在上海大学接待回访的美国历史学家。他的热情、真诚、细致和充满才智的风趣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深刻的影响。东来是极为难得的人才，敏锐而勤奋，不仅在美国史、美国宪政和国际关系研究等领

域中有诸多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美国史研究学界的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也做出过持久的奉献。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美国研究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损失。我对东来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请向东来的家人转达我的哀思与问候。

王 希

2013年5月2日于美国

##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世界史学科唁函

南京大学任东来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任东来先生英年早逝，我们万分悲恸，深感痛惜。任先生是一位卓越的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特别是在美国宪政史领域造诣深厚，影响远播。他治学严谨，品德高尚，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他的逝世不仅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一件无价瑰宝的失落。我们无限追思与任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在此谨表深切哀悼之意，并祈请任先生家人节哀顺变。

任东来先生千古！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世界史学科

5月2日子夜

## 南开大学韩铁教授唁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惊悉东来教授因病去世，沉痛不已！请代我向他的家人转致我深切的哀悼。

一年前，东来教授还与其学生一起为拙著写了书评，不期今日竟然天人永隔，痛哉，痛哉！唯有老骥伏枥，继续耕耘，以不负东来之鼓励与期望。

韩 铁

2013年5月2日早晨8点零5分于温哥华

## 山东大学白雪峰唁函

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治丧委员会：

惊悉任东来教授不幸逝世，至为震惊和悲痛！任东来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史专家，学术成就卓著，真诚无私地提携后学，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他的英年早逝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